

社会改良还是 社会革命？

罗莎·卢森堡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 024 1995 3

社会改良还是 社会革命？

罗莎·卢森堡著

徐 坚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Vulkan Verlag Leipzig, 1919.

根据莱比锡火山出版社 1919 年版译出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德)罗莎·卢森堡著

徐 坚 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frac{3}{4}$ · 字数 81,000

1958年 7 月第 1 版

1958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9) 0.50 元

统一书号 3002·52

校对者: 崔小南等

出版者說明

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著作，是维护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文献。

罗莎·卢森堡在这本著作中用鮮明的事實、严谨而鋒利的論証，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修正主义論点，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不过，她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并非彻底馬克思主义的，比如在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的問題上，她就不了解不仅必須从思想上而且必須从組織上同他們划清界限。所以，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关于党内組織原則問題展开斗争时，她就曾站到孟什維克那一方面。然而，罗莎·卢森堡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正如列寧說的：“鷹有时比鶲还飞得低，但鶲永远不能飞得象鷹那样高。……虽然犯了这些錯誤，但她始終是一只山鷹。”

今天，当我们正向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温习一下罗莎·卢森堡当年为反对伯恩斯坦主义而写的这本著作，是会大有教益的。因此，我們决定将这本著作翻譯出版。

目 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1
第一部分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2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7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15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22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結論和一般性質	27
第二部分	
一 經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35
二 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43
三 夺取政权	52
四 崩潰	61
五 机会主义的理論和实际	65
民軍和軍国主义	71
站在工人背后的“德意志科学”	88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第一部分^①

本文的标题，初看会叫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么？或者說，它可以把成为它的最終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現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么？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認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現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各种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說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終目的、达到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必經之路。社会民主党認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們在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理論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报上的、題目叫作“社会主义問題”的一批論文中，特別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这一著作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論。这整个理論，总结起来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

① 这是对于伯恩斯坦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上的一批論文“社会主义問題”的評論。那些論文在1898年由萊比錫“人民报”印成单行本。

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曾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是这样写的：“在我看来，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个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适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装饰品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为如此，“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在伯恩斯坦的意义上，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同时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斯坦及其门徒论辩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认识这一点，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运动中影响的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斯坦从理论上表述了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想，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靠拢党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上风、依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盲目的企图。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的现象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在伯恩斯坦理论的面前，就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的反映。伯恩斯坦的理论，是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

長眠之後主張通過社會改良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英國機器工人失敗之後主張由工會監督生產過程的理論，是在薩克遜已經修改了憲法、國會普選權已經被扼殺之後主張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爭取多數的理論！可是，伯恩斯坦論述的重點，我們看來，不是他關於社會民主黨的實際任務的見解，而是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客觀發展過程所說的話，那些見解同這些話當然有著最密切的聯繫。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越來越表現出更大的適應性，另一方面，由於生產越來越分化，資本主義由於本身的发展而發生崩潰的事，看來越來越不可能了。資本主義的適應性，照伯恩斯坦的看法，表現在三方面：第一，由於信用制度、企業主組織和交通通訊工作發展，普遍性危機消失了，第二，由於生產部門不斷分化，也由於無產階級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間階層的地位，中間階層表現出頑強性，最後，第三，由於工會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從此得出的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實際鬥爭的總的指示是：它的策略，不是去掌握國家政治權力，而是去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不是通過一個社會政治危機去實行社會主義，而是通過逐步擴大社會控制、逐步貫徹合作原則去實行社會主義。

伯恩斯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論議中有什么新的東西，他倒以為這些論議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說法，同社會民主黨一貫採取的總方針，意思是一樣的。可是，在我們看來，很難否認，伯恩斯坦的見解實際上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途徑有著根本的矛盾。

如果伯恩斯坦的全部修正總起來說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比人們平常設想的要慢的多，那麼，這種看法在實際上只是

意味着把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从此得出的结果，实际上顶多是斗争的速度放慢而已。但是，事情不是这样。伯恩斯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过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理论总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必须分别两个方面：其一，是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表面形式。这里的根本思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成为不可能存在。人们把这个时机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但是，虽然如此，对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附带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大家知道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斯坦所拔掉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一定形式，并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本身。他明确地说过：“或许有人答复说，当人们说到现代社会的崩溃时，心目中多半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剧烈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矛盾引起的总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由于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现在的生产制度看来不是更有可能而是更不可能发生一个几乎同时

的全面的崩潰，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适应性，另一方面，——或者說，与之同时——工业分化的过程加强了。”^①

如果是这样，倒出了一个大問題了：究竟我們为什么还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够达到我們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資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現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同伯恩斯坦一样，認為資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崩潰，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觀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从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只剩下資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就是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一点，伯恩斯坦也看到了的，他說：“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潰論后）毫不丧失信心。因为，仔細看來，我們前面指出过的廢除或改变从前的危机的一切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它們同时也就是使生产和交換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它的出发点的一切东西。”^②

只要稍为考慮一下，就可以証明这也是个錯誤的結論。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貸、完善的交通工具、工人阶级的提高等等現象当作資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現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現象废除了或者至少緩和了資本主义經濟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見，廢除危机，就是指在資本主义基础上廢除生产和交換之間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升到中間阶层，——就是指資本和劳动之間的矛盾的緩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貸、工会之类废除了資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資本主义免

① “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5頁。

② 同上，第554頁。

于崩溃，把资本主义保存了下来，——因此伯恩斯坦才把它們称作“适应工具”，——那么，它們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現为“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出发点”呢？显然，这是就它們更强烈地表現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說的。但是，既然它們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資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來說，它們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无須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过渡就成了多余的事了。因此，这些現象的表現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就只是就概念上說是如此，而不是就历史上說是如此了，也就是说，根据我們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們知道这些現象是同社会主义有連帶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們不但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多余的事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資本主义日益尖銳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崩溃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崩溃已經由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信服力量是以它自己的想象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們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綱領的一个出于“純知”的根据，即唯心的根据，而客觀必然性、即出于物質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論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在将来也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出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內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論是正确的。或者，“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資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因而它的矛盾能够废止，如果是那样，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

就成为人們願意它怎样它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一个結果。这个两刀論法，总起来說也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烏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烏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論就必然站不住。問題就在这里。

二 資本主义的适应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使资本主义經濟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改良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組織。

从信用說起吧，信用在资本主义經濟中有多方面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增加生产的扩张能力并媒介和便利交換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超越私有制的界限而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私人資本的有限規模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这个限制的手段，把許多个私人資本溶合成为一个資本——股份公司——，并讓一个資本家能够去支配別人的資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当作商业信用，它加速了商品交換，因而使資本更快地回到生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最主要的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有什么影响，是容易看得出的，既然，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危机是从生产的扩张能力、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矛盾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說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得这种矛盾尽可能經常爆发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造成促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場界限的内在动力。而它又是从两方面着手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以商品交換的媒介的資本

把自己所喚起的生产力打击的更加彻底。銷路滯塞的現象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縮了，它在成为必需的地方遺弃了交換，而在它还提供的地方，则証明自己沒有作用也沒有目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費能力縮減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重要后果以外，还有許多影响。信用不但向一个資本家提供了支配別人資本的技术手段，并且同时是推动一个資本家肆无忌憚地用別人資本进行大胆投机的刺激。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換的不講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銳化，并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交換变成了一个十分集中和精致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屬貨币作現實的基础，因而很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

由此可見，信用虽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那怕減輕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別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最一般地說——不外是从一切資本主义关系中清除等級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輸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資本主义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张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力量。因此，危机——这不过是資本主义經濟中互相对抗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这同时把我們引到另一个問題上来了，信用究竟怎样能够表現为資本主义的一个“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的“适应”，不論从什么角度和什么內容来設想，它的本質显然只能是平衡資本主义經濟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者緩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縛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現今資本主义經濟中，如果有一个手段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頂的話，这个手段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强了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

之間的矛盾，因为它使得生产变成极端紧张，但是使得交換稍为遇到些什么就会瘫痪下来。它加强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間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資本变成一种社会的东西，而利潤的一部分却采取資本利息的形式，因而資本变成了一种單純的財产权。它加强了財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剥夺許多小資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結合到少数人手中。它加强了生产的社會性和資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因为它使得国家参与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总而言之，信用把資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推动它們达到极端，加速了它走向自己的灭亡（崩溃）的过程。因此，如果說要在信用方面替資本主义找一个适应手段的話，那么，它首先應該是废止信用，撤銷信用。象現在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倒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破坏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越出資本主义本身的作用，甚至迷惑人們去作社会主义气味的改良方案，使法国的伊薩克·貝勒之流的竭力主张信用的人們，如馬克思說的，表現为一半象先知，一半象废物。

資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企业主的联合組織，在仔細研究之后，証明这也是不堪一击的。依伯恩斯坦的說法，这种組織，通过管理生产的方法，應該使无政府状态告一結束，防止危机。当然，对于卡特尔和托辣斯的发展，还没有从它們的多方面的經濟作用研究过，这个現象，还只是一个問題，只有运用馬克思的學說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只有当卡特尔、托辣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說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組織防止資

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就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禁止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到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这个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又只有牺牲别的部门才行，因此，它恰恰不能变成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居然包括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就在它实际应用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废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要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而所要求的利润率则低得多，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结果，在国外剧烈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工业卡特尔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总之企业主联合组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形态，只应该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一定的局面来理解。实在是这样！归根结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个别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的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本地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这就是说，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对于疾病正是半斤和八两，到一定期间为止，比如对于小病，那是有效的，但是再往前去就不行了。当世界市场十分成熟，给竞争着的资本主义各国占完了地盘，——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的，——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

候，把一部分資本勉强閑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增长到这种程度，以致連医生自己也病倒了，由这些組織大大社会化了的資本，就反过来变成私人資本。每个私人的資本部分，就要憑自己的本領用变小了的財产到銷售市場去为自己找一块小小地盤。到那个时候，这些組織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再讓位于加强了多少倍的自由競爭①。

因而，总的說来，卡特尔正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归根結底只有使資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化，使它的內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使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因为它把生产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斗争发展到极頂，就象我們特別是在美国見到的那样。它还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因为它把組織起来的資本的威勢以最残酷的形式与劳动界对立起来，因而資本与劳动之間的对立达到了极端。

最后，它使資本主义世界經濟的国际性和資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因为它有普遍展开的关税战争作为隨伴的現象，因而各个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对立趋于极端。此

① 恩格斯在1894年給“資本論”第三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說：“自从写了以上一段話(1865)以来，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別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場上的竞争是大大加强了。迅速而大量高涨的現代生产力，日益超过了資本主义商品交換規律的高度，前者原来應該在后者范围之内活动的，这个事實今天迫得連資本家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得到了。这一点特別表現在两个征象上：第一、新的普遍的保护关税的热狂，它同过去的保护关税措施不同的地方，特別表現在恰恰是輸出品最受保护。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門的厂主們为了調節生产、价格和利潤而成立的厂主卡特尔(托拉斯)。一看就明白，这些試驗只在經濟气候順利的时候可以实行。第一陣风雨必然把它們抛上垃圾堆去，并且證明，尽管生产是需要調節的，但配担当这个責任的一定不是資产阶级。暫时，这些卡特尔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大的吞小的，比以往吞的还快。”(參閱“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6頁)

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等还有直接的和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样看来，卡特尔和托辣斯，就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不仅不是什么消除它的矛盾的“适应手段”，恰恰是使它加强无政府状态、使它所包含的矛盾暴露，并加速它的崩溃的手段之一。

可是，如果说信用和卡特尔之类并不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怎么会自从1873年以后二十年之久没有普遍的商业危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不是过时了吗？

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在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打得一败涂地。同时，这证明了，有些人因为看到马克思危机理论两次据说“到期”不灵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是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的非本质的表面枝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周期定为十年一期，这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非依据什么自然规律，它所依据的，是同年青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明确的历史情况。

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前十年间大规模投资兴筑道路、开凿运河和设立煤气厂的结果，事情主要是在英国，正如危机本身也是在英国。接着的1836—1839年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新的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建筑铁

路的热狂召来的(1844—1847年,即三年間議會特許新建鐵路約15亿泰勒!)。因此,所有这三次情况,都是由于資本以各种形式为經濟奠定新的基础、为奠定資本主义发展的新基础,引起了危机。在1857年,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銷售市場,这是发现金矿的結果,在法国特別是由于大規模兴建鐵路,它追随了英国的足迹(1852—1856年法国兴建了新鐵路12.5亿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奧国奠定新基础的直接后果,是那里在1866年和1871年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大工业高潮的后果。

因此,到現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資本主义經濟范围的突然扩大。至于那些国际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複一次,本身純粹是外表的、偶然的現象。馬克思关于危机的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提出的那样的图式,关于危机的內在結構和危机的藏在深处的一般原因的部分,对于所有的危机都是切合的,不論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或者五年一次,或者交替地是二十年一次和八年一次都好。但是,最中肯地証明伯恩斯坦理論缺乏根据的是这个事实:最近的1907—1908年的危机,恰恰是在优美的資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訊和托辣斯——最发达的那个国家鬧得最凶。

一般地說,資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換这个假設,以下述的两者之一为前提:或者是,世界市場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是,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着阻碍,以致它不会超出市場的框子。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与事实违反,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門一步紧接着一步地前进,每天在喚起新的生产力。

还有一个現象，在伯恩斯坦看来，同曾經指出过的資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是矛盾的，这就是他指給我們看的中等企业这个“簡直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看到这是一个标志，說明大工业的发展并沒有起那么革命的和集中的作用，好象依照“崩溃論”應該期望它起的那样。可是，如果人們以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表面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誤解了。

小資本在資本主义发展的总进程中，恰恰和馬克思設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鋒作用，而这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的扎了根的部門中应用新的生产方法，一方面，建立起大資本所还完全沒有經營的新的生产部門。以为資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历史是直綫倒退、逐步灭亡的那种見解，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里也完全是辯証的，不断在矛盾对立中运动着的。資本主义的中間阶层，正如工人阶级一样，也受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所影响，一种是提高他們的趋势，一种是压低他們的趋势。压低的趋势是：在現實情况下，生产規模不断扩大，周期地超过中等資本的范围，因而中等資本一再被抛到競爭之外。提高的趋势是：現存資本的周期貶值，使得生产規模——就最低限度必需資本的价值說——又一再暫時縮小，此外，資本主义生产的进入新的領域，也屬於提高的趋势。我們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資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規的战争一样，在战争中，較弱的一方部队是直接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在这里，宁可說象割草，小資本被周期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讓大資本的鐮刀来再割。两种趋势好比玩捉球戏，資本主义的中間阶层就象个球，两种趋势中，归根結底总是压低的趋势胜利，这是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的。但是，这决不表现为中間阶层絕對数減少，而是表現在：

第一，在旧工业部門中，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須的最低限度資本額逐漸提高了，第二，小資本从自己手上經營新工业部門得到安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個別小資本說是生存期間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資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個階級說，是社會代謝(sozialer Stoffwechsel)，意指丧失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为别的阶层所吸收。——譯者)越来越快。

刚才說的这些，伯恩斯坦知道的很清楚，他自己就確証过。他所忘記了的似乎是这一点，就是有了这些，資本主义中等企业的运动規律也就有了。小資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鋒，技术进步又是資本主义經濟的生命的动脉，那么，小資本显然是資本主义发展所不可分离的、隨伴現象，它要到資本主义消失的时候才一起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如果是在伯恩斯坦認為問題所在的統計上的絕對总数的意义上，——那么，它就不是象伯恩斯坦所想象的那样，表示資本主义的革命的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倒是表示資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利潤率，即資本的按比例的增长，首先对于一切的独立結集中的資本幼株是重要的。一到資本的形成专门落在少数几个成熟了的……大資本的手中时，一般說来，活跃的生产之火就会熄灭。生产就会昏昏入睡。”^①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拒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的“崩潰論”。那么，照“資本主义适应論”的觀点看来，达到社会主义的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9頁。

道路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伯恩斯坦只作了暗示，依伯恩斯坦的思想详细论述的，是康拉特·施密特^①。照他的说法，“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统制”，通过立法“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直到最后“资本家眼看着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从驯服了的资本家解除领导和管理企业的职务”，这样，终于把社会主义企业建立起来了。

由此可见，工会、社会改良、还有伯恩斯坦补充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这就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

我們从工会說起，工会的最重要的职能，——伯恩斯坦自己就在1891年的“新时代”报上解释过，誰也沒有比他解释的更好，——在于它是站在工人方面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手段，这个规律就是照劳动力在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工会对无产阶级服什么务？在于为自己利用每一个时候的一定的市場情况。但是，这个情况本身，——一方面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中間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的自然繁殖造成的劳动力的供給，最后，还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是在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的。因此，工会不能推翻工资规律，它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叫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的“正常”界限之内进行，但是决不是逐步地取消这种剥削。

当然，施密特把现在的工会运动称作“孱弱的开始阶段”，他相信将来“工会对生产本身的调节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

^① “前进报”，1898年2月20日，文学評論。伯恩斯坦对于“前进报”上关于他的意見的評論，連一句不同意的話都沒有表示，我們更相信應該把康拉特·施密特的解釋同伯恩斯坦的解釋联系起来研究了。

产調节这个名詞，人們只能有两种理解：第一是参与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第二是决定生产本身的范围。在这两个問題上，工会的参加能够是什么性質呢？显然，关于生产的技术方面，資本家的利益同資本主义經濟的进步和发展，在一定范围之内是一致的。正是他自己的急需在推動他去改进技术。反之，个别工人的态度倒是恰恰相反的：任何技术革命，因为它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使劳动更紧张，更单调，更繁重，所以同它所直接接触的工人的利益是违反的。如果說，工会可以参与生产的技术方面，那么，它的参与，显然只能在后一意义上，即代表直接有关的个别工人集团的思想来参与，因而，就是去反对革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解放的利益，恰恰相反，它是在反动的意义上处理問題，这是因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解放的利益倒是同技术进步一致的，也就是說同个别資本家的利益一致的。事实上，我們看到，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去发生影响的企图，不是在施密特所追求的未来，而是发生在工会运动的过去时代。它标志着英國工联主义的旧阶段（60年代为止），在那个阶段上，工联主义还同中世紀行会的传统千絲万縷地联系着，典型地表現在給过时的原理——“既得的适当劳动权利”（“Erworbenen Rechts auf angemessene Arbeit”）——帶着走。^①由工会去决定生产范围和商品价格的企图，相反，倒是最近出現的新現象。我們是在最近才看到——又只是在英國——有这方面的企图露面。^②但是，这个企图，同刚才講过的那个企图，从性質和趋势上說，是同样的价值。工会的积极参加决定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到底必然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工人同企业主一道

① 韦伯著“工会的理論与实际”第二卷第100頁以下。

② 同上書第115頁以下。

結成卡特尔反对消費者，并且运用强制措施来反对过来竞争的企业主，这些措施并不比平常企业主联合組織运用的方法差。从根本上看，这已經不再是劳动和資本之間的斗争，而是資本和劳动力結成统一战綫向消費社会斗争。从它的社会价值看，这是一种反动的开端，因此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步驟，因为它宁可說恰恰代表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它的实际价值看，它是个烏托邦，稍加思索就可以証明，它決不能包括較大的和为世界市場生产的一些部門。

因此，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增加工資和縮短劳动時間的斗争，就是說，仅仅限于依据市場情况調节資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这件事，由于事情的本質所决定，仍然是工会所作不到的。不止这样，工会运动发展的整个进程，走着同施密特所想的恰恰相反的方向，它要使劳动市場完全脱离同其他商品市場的任何直接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實是，通过按生活費指数調整的活動工資表制度使劳动合同同一般生产情况至少消极地直接联系的那种企图，現在也落到事物的发展之后了，英國工联越来越躲避这种作法。^①

但是，就連工会运动事实上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它也不象資本适应論所假想的那样超于无限扩张。完全相反！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較大的范围着眼，人們就不能不关心到我們所处的时代，总的說來，这不是一个胜利地发展势力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困难增加的时代。如果工业的发展已經达到了頂点，資本在世界市場上开始走“下坡路”，那时候，工会斗争还会加倍困难：第一，对于劳动力來說，客觀的市場情况恶化了，因为需求增加的慢，供

① 布伯著“工会的理論与实际”第二卷第 115 頁。

給增加的快，現在情況就是這樣，第二，資本本身，為了彌補世界市場上的損失，會越來越頑固地收回已經歸給劳动者的那部分產品。克減工資不正是阻止利潤率下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嗎①！英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正在開始的工會運動第二階段的圖景。在這種情況下，工會運動不得不日益單純地從事保護既得的成果，並且連這件事都越來越困難。上述的总的局勢是這樣一個局勢，它的背面必然是政治的和社會的階級鬥爭的高漲。

在社會改良問題上，施密特同樣是犯了顛倒歷史遠景的錯誤，他相信社會改良“同工會組織拉起手來給資產階級訂出條件，必須遵守條件才許可應用勞動力。”伯恩斯坦在這樣理解的社會改良的意義上，稱工廠法是一點“社會統制”，既然是一點“社會統制”，因而也是一點社會主義。施密特在說到國家的勞動保護的地方，總是說“社會統制”，他這樣就巧妙地把國家變成了社會，然後他已經敢於補上：“就是說，上升中的工人階級”，通過這樣的手法，無辜的德國聯邦議會勞動保護條例就一變而成為德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措施了。

這裡的欺騙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國家恰恰不是在“上升着的工人階級”這個意義上的“社會”，而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代表，即階級國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會改良也不是一種“社會統制”工作，就是說，不是自由的、劳动着的社會對自己的劳动過程的統制，而是資本的階級組織對資本的生產過程的統制。因此，在這裡，資本的利益，也就是社會改良的自然界限。當然，伯恩斯坦和施密特在這方面現在也只看到仅仅是“孱弱的開始阶段”，他們相信將來有一個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無限高漲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頁。

的社会改良。可是，这么一来，他們就犯了同样的錯誤，如同他們設想工会运动势力的无限发展一样。

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論，以一定的客觀发展作条件，既包括資本主义所有制的一定发展，也包括国家的一定发展，这里是这个理論的重点所在。关于前者，未来发展的图式照施密特的設想是：“限制資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他看到生产資料似乎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剥夺，就准备了一个逐步剥夺的理論。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必須的条件，就是把所有权分割为“总所有权”(Obereigentum)和享用权。他把“总所有权”归給“社会”，他希望它不断扩大，享用权留在資本家手中逐步縮小到成为不过是对他的企业的管理权。这种想法或者是随便說說的文字游戏，其中并无重要之点要进一步考慮。那么，逐步剥夺論就一点遮盖也没有了。或者，它是一个認真考虑过的关于法权发展的图式。那么，它就是完全錯誤的。包含在所有权內的各种权限的分割，——施密特在这里替資本“逐步剥夺”論找了个藏身之所，——是封建自然經濟社會的特色，在这种社会中，生产物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是采取实物形式，并且根据領主和臣屬之間的身分关系来进行的。这里，所有权的分割为几种局部的权利，是事先决定的、社会財富的分配組織。随着过渡到商品生产，随着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人們之間一切身份联系的消灭，相反，人与物之間的关系——私人所有权——巩固起来了。由于分配不再是通过身份关系而是通过交換，各种对于社会財富的要求权的計算，就不是靠分割一个共同对象的所有权，而是靠各人带到市場上的价值。随着中世紀城市公社中商品生产的兴起，出現了法权关系的第一次突变，在所有权处于分割状态的封建法权关系的娘胎里，成长了

絕對的、排他的 (geschlossener) 私人所有权。但是，在資本主义生产中，这个发展繼續前进着。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純粹建立在交換基础上，資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权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資本所有权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生产物的权利，变成純粹是占有別人劳动的权利。当資本家还是自己領導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关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領導日益变成多余，直到在股份公司中变成完全多余，資本所有权就变成完全同本人与生产的关系脱离了的、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头銜，以最純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現。在股份資本和工业信用資本的形式上，資本主义的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因此，象施密特所描繪的資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从所有者到仅仅是管理者”，是顛倒了的实际发展，实际发展正相反，是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仅仅是所有者。这里，歌德的詩句用在施密特身上就很恰当，他說：

Was er besitzt, das sieht er wie im weiten,
Und was verschwand, wird ihr zu Wirklichkeiten.
(抓在手上的，看起来恍恍惚惚，
早已消失的，对他倒真真实。)

他的历史图式，如果从經濟方面看是从現代股份公司退到手工工場、甚至退到手工作坊，从法律方面看，是从資本主义世界縮到封建自然經濟的蛋壳中去了。

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統制”也就同施密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統制”起作用的，——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事实上同所有权上的一份、同“总所有权”毫无关系。它們的活动，不是对資本主义所有权的限制，相反倒

是对它的保护。或者在經濟上說，它們不是对資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調節、安排。如果伯恩斯坦提出这样的問題：是不是在一个工厂法中或多或少总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么我們可以回答他說，在市參事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气灯的規定中有多少“社会統制”，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

四　关税政策和軍國主义

照伯恩斯坦的說法，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国家的发展成为社会。今天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国家，这已經是常識。可是，在我們看来，这个命題同与資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所有一切命題一样，不能理解死了，不能絕對化，要在流动的发展中来理解。

資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国家就成了資产阶级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使国家的本質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它不断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不断給国家担负新的职能，特別在經濟生活方面使国家的干預和統制越来越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它为将来的国家同社会的溶合，为所謂国家职能的归还給社会，逐渐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角度上，未尝不可以說資产阶级国家向社会发展。馬克思說劳动保护是“社会”对于它的社会生活过程的第一次有意識的干預，伯恩斯坦引过这句话，无疑地，这句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說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說，也是由于資本主义的这个发展，国家本質中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統治地位的資产阶级的一个組織。如果国家为社会发展的利益担任了各

种普遍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同整个統治阶级一般利益相符合的，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才担任了这些职能。例如，劳动保护，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資本家來說，如同对于整个社会一样，同样是同直接利益相符合的。但是这种协调只繼續到資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止，如果发展已經达到一定的高度，作为一个阶级的資本家的利益，就同經濟进步的利益——也是在資本主义的意义上說的——开始分离了。我們相信这个阶段已經到了，这一点表現在今天社会生活的两个极重要的現象上，表現在关税政策和軍国主义上。关税政策和軍国主义，在資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經起过它们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个别国家里，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大工业的兴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变了。今天，保护关税不是用来扶植年青工业使其成长，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过时的生产形式。从資本主义发展的发展的觀点看，也就是从世界經濟的觀点看，究竟德国向英国多出口商品还是英国向德国多出口商品，并无分别。从这个发展的觀点出发，摩尔已經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走了。对，他原来應該走了。現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賴的，对于这些商品征收了保护关税，就会使本国的另外一些商品的生产昂贵，这就是說，又再束縛了工业。但是，从資产阶级利益的觀点看来，事情不是如此。工业为自己的发展并不需要关税来保护，但企业主却要保护銷路。这就是說，关税今天已經不再当作一个保护手段，保护上升中的資本主义生产去对抗那些更成熟的資本主义生产，而是当作一个民族資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資本集团的斗争手段。关税，当作保护工业、形成和征服國內市場的手段，已經不再有必要了，它倒成为工业卡特尔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

段，成为資本主义生产者同消費者的社会进行斗争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最后，最鮮明地表現了今天关税政策的特質的，就是現在在关税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工业，而是业农，就是說，关税政策已經變成將封建利益注入資本主义的形式并且用來表現封建利益的手段了。

軍国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如果我們不是用本来可以怎样或應該怎样的眼光看历史，而是根据它事实上怎样来看，那么，我們必須承認，战争对于資本主义的发展曾經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島各国，俄国和波兰，这些国家都是从战争中得到了資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或者推動的，不論是从胜利或者是从失敗得到的，事情总是一样。只要有这样的国家，国内还有分裂状态或者自然經濟的閉塞状态需要克服，軍国主义也就起着資本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作用。今天这方面的情况也变了。如果世界政策已經變成威吓着人們的冲突舞台，那么，問題既不在于把新的国家納入資本主义，也不在于已經移植到世界別的部分而在那里爆发的現成的欧洲式的对立。今天执着武器面对面登場的，不論在欧洲或者在世界別的部分，不是这一面是資本主义国家，那一面是自然經濟的国家，而是这样的国家，正由于他們同样具有高度的資本主义发展，因而迫着要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一旦爆发，由于它給資本主义各国經濟生活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引起剧烈变化，对于資本主义的发展自然只能有致命的意义。但是，从資产阶级的立場看来，事情并非如此。今天，軍国主义已經对他們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里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是个斗争手段，用来拥护竞争着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第二，它是最重要的投資形式，无论对金融資本或工业資本來說都是如此，第三，它是國內阶级

統治的工具，用来反对劳动人民。——这一切利益，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說，最足以暴露今天的軍国主义的这种特殊性質的，首先是軍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为比賽而普遍高涨，所謂受着本身內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動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完全沒有的現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質，命定的性質，而引起爆发的直接原因、最先牵涉到的国家、爭執的对象以及一切詳細情况，却还完全不能确定。

前面說到社会发展和統治阶级的利益，是彼此分裂的，国家在这个分裂中，站在統治阶级方面。国家同資产阶级一样，在政策上同社会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日益喪失着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的資格；在同一程度上，它日益变成純粹的阶级国家。或者說得确切些，国家的两种性質彼此分离了，并且日益尖銳化成为国家本質内部的一个矛盾。因为，一方面，国家的一般职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預、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統制”是增长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性質迫着它把它的活动的重点和权力手段，日益用在只对資产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范围中，用在軍国主义上，用在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上。其次，由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統制”也越来越为阶级性質所渗透和支配(参考一切国家的劳动保护措施)。

上面所說的国家本質方面的变动，同民主主义的成长——伯恩斯坦把民主主义也当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并不矛盾，不如說，倒是完全符合的。

施密特說过，爭取社会民主党在議会中的多数，甚至是这种逐步使社会社会化的直接道路。当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是最清楚地表現出国家向社会发展的一种現象，这是无疑的，在这

个限度內，它成为走向社会革命的一个步驟。可是，我們描写过的、在資产阶级国家本質中的那种分裂，倒是最鮮明地表現在現代議会制度中。誠然，从形式上說，議会制度要国家机构表現整個社会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現的仍然不过是資本主義社會，資产阶级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說是民主的組織，变成了就內容說是統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有一个事实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只要民主一有否定阶级性質、变成实际的人民利益的工具的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資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面对这种情况，爭取社会民主党在議会中的多数这种思想，是完全在資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中作出的一个計算，只算了民主的形式的一面，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到它的另外一面、它的实在內容。議会制度，就整个來說，不是象伯恩斯坦所假想的那样，是一个逐漸滲透到資本主义社會中去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資产阶级國家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手段使資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成长。

在国家的这种客觀发展之前，伯恩斯坦和施密特关于“社会統制”的成长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的信条，就成了与現實日益矛盾的一句空話。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論，总起來說，就是逐步在社会主义精神下改良資本主义所有制和資产阶级國家。可是，这两者由于現今社会的客觀过程，是朝着恰恰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過程是越来越社会化了，而国家对这个生产過程的干預和統制越来越广。但是同时，私人所有制越是變成对別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資本主义剥削，国家統制越是充滿阶级利益。因此，資本主义國家（即政治組織）和所有权关系（即法权組織），随着发展越是成为資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它們在逐步实行

社会主义的理論之前，提出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傅利叶想用他的Phalansteie(空想共产团体——譯者)制度把地上的海水全部变成檸檬汁，真是异想天开，可是伯恩斯坦要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檸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是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則相反，它們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間，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墙。这座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只会因之更加牢固。要打垮这座墙，只有靠革命的錘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結論和一般性質

我們在第一章中想說明：伯恩斯坦的理論，是要把社会主义綱領从物質基础上举起来，錯誤地放到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去。这是关于理論根据的問題。那么，这个理論，放到实际工作上，又怎样表現的呢？最初，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到今天为止的通常实际工作并无分别。工会、社会改良的斗争和政治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表面內容的东西。因此，区别不在于什么，而在怎么干。就現今实际情况說，工会斗争和議会斗争，是作为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逐步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来理解的。照修正主义的見解，既然夺取政权是沒有可能和沒有目的的，这些斗争就只應該期望直接的結果，就是說，只應該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質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資本主义剥削和扩大社会統制。如果我們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个目

的置而不談，——因为这个目的是到現在为止的党内普通的觀點和修正主義的觀點所共有的，——那么，全部區別可以總結為：依照普通的觀點，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把这个革命的主觀因素即无产阶级准备好。依照伯恩斯坦，它們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限制了資本主义剥削本身，从資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地取去資本主义性質，蓋上社会主义性質，总之，它們應該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客觀上实行起来。因此，人們仔細一看，这两种觀點甚至是恰恰相反的。从党内普通的觀點看来，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可以深信用这些斗争来根本改变自己地位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从伯恩斯坦的觀點看来，人們从夺取政权的不可能性出发，結果是通过單純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工会斗争和議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質，在伯恩斯坦的觀點中，是在于相信它們对資本主义經濟的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在事实上——象我們已經表述过的那样——純粹是空想。資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归根結底說來，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同社会主义根本沒有任何关系。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使无产阶级的認識和意識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組織起来。当人們把它們理解成直接使資本主义經濟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們不单丧失了为它們捏造的作用，并且同时也丧失了其他意義：它不再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教育工人阶级的手段了。

由此可見，当伯恩斯坦和施密特自己安慰自己，以为就是把全部斗争限于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就工人运动來說也沒有喪

失目的，因为在这个軌道上的每一步都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当作一个趋势的运动本身，——在这时候，他們是以一个完全錯誤的理解为依据的。如果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來說，情况倒的确如此，其所以如此，因为在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的面前，有夺取政权的自觉而坚定的企图作指路明星。可是，如果有人把这种事先确定了的企图与运动分开，首先把社会改良本身当作目的，那么社会改良不仅不是向着实现社会主义最終目的走去，而且恰恰相反。施密特簡單地相信所謂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根据吃食生胃口的格言，認為工人阶级不到社会主义完成就决不会滿足。最后的这一点假定，当然是对的，而資本主义社会改良之无能，本身就为它向我們作了保証。但是那个从此得出的結論，却只有在对今天社会制度所进行的象一个鏈子一般連續不断的、日益增多的社会改良能直接构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但这是空想，这个鏈子，就事情的本質說，很快就要断了，断了以后，运动所采取的可能的途径有好多种。

那时，最接近和最可能的結果，是策略上放緩一步，以便用尽一切办法讓斗争的成果、即社会改良的成果得以实现。一旦直接实际收获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調和的、严格的阶级立場就越来越只是一个障碍，因而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用正确的德文說是“賄賂政策”，以及調和讓步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就是在這一步上运动也不能停留太久。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一經成为空壳，不論人們采取什么策略它总是存在着，那么，在邏輯上，下一步就是对于社会改良也失望了。——社会改良是一个避风港，施摩勒教授之类現在正是停泊在这个港里，在社会改良的海水上

鑽研形形色色的事物，以便最后讓一切听天由命。^①——由此可見，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論在任何环境之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銳化的結果，又是工人阶级認識到絕對必須用社会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結果。如果象修正主义那样，不承認前者，又拒絕了后者，那么，工人运动最初是变成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最后并由于本身的重力而走到放弃阶级立場。

如果我們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修正主义理論，給自己提出一个問題：这种觀点的一般性質究竟是什么？那么，刚才指出的那个結論也就明白了。修正主义显然不是站在資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資产阶级經濟学者們一起否認資本主义矛盾的，它在理論上倒是也同馬克思主義的觀点一样，把这种矛盾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从此出发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理論上不認為这些矛盾的消灭要通过它們自己的彻底发展，不是以此为根据。——这一点，既是修正主义觀点一般的核心，也是它同到现在为止的普通的社会民主主义觀点的根本分歧。

修正主义理論处于两个极端之間，它不願意資本主义矛盾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尖头上消灭矛盾，它倒願意折断矛

^① 1872年，瓦格納、施摩勒、勃凌塔諾等教授在厄森納赫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大張旗鼓地宣布他們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奧本海姆譏諷地称为“講坛社会主义者”的人，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些“講坛社会主义”的人們已經以議員資格投票拥护延长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了。这个同盟的全部活动，除此以外，就是常年开大会，会上宣讀討論各种問題的几篇教授報告，其中，关于經濟問題已經由同盟出版了100多本厚書。这些教授，除了主张社会改良以外，还拥护保护关税和軍国主义之类，而对于社会改良，一点也沒有动手。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都放弃了，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問題去了。

盾的尖头，緩和矛盾。于是，它以为，危机的迟来和企业主联合組織應該緩和生产与交換之間的矛盾，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和中間阶层的繼續存在應該緩和資本与劳动之間的矛盾，社会統制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應該緩和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間的矛盾。

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策略，也不是說人們等着資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到极端，等着它們到那时候才发生的突变。相反，我們只是依靠已經認識的发展方向，于是在政治斗争中使矛盾的后果发展到极端，这是一般革命策略的本質。因此，例如对关税和軍国主义，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們的反动本質完全暴露了再說。伯恩斯坦則不然，他在策略上根本不是依靠資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尖銳化，而是依靠矛盾的緩和。当他談到資本主义經濟的“适应”时，他把这一点說的最露骨。这种觀点什么时候有过証明呢？今天社会的一切矛盾，只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們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朝着到今天为止所取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就必然会不可分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使矛盾尖銳化而不是使矛盾緩和。因此，矛盾的緩和，反過來說，是以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滯为前提条件的。总之，伯恩斯坦的理論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資本主义发展的停頓。

在这个前提下，自然建立起这个理論来，并且有两个方面。因为，第一，这个理論，在有关社会主义最終目的方面，暴露出空想性質，——一个停滞的資本主义发展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望而知的，——这里，我們关于这个理論的实际結論的說明得到了証明。第二，这个理論，从資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的事实看，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質。現在出現了这么一个問題：資

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解释伯恩斯坦的理解方法，或者不如說，怎样才能把它的特征表現出来？

伯恩斯坦在他的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經濟前提——他的資本主义“适应論”，是站不住的，这一点，我們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經說明了。我們在那里看到，不論信用或者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資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論暂时延迟了的危机或者中間阶层的繼續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資本主义适应性的征象。但是，上面說到的适应論的一切細节，——姑且不管它們直接的錯誤，——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作为基础的。这个理論，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經濟生活現象，不是放在它們对資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的关联上去理解，不是放在它們同整个經濟结构的联系上去理解，而是把它們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如此。如果看到，信用是內在于交換的矛盾的一个自然发生的較高阶段，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仿佛是什么处于交換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如不能把貨币本身、不能把商品、資本看作資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信用也是在資本主义經濟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有机的一环，它在这一点上絲毫不次于貨币、商品和資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完全同它們一样，既在經濟的齒輪联动机构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齒輪，同时由于它增加了內在矛盾，它也是一个破坏工具。

至于卡特尔和完美的交通工具，情况完全一样。

伯恩斯坦把危机的延迟当作資本主义經濟“适应”的征象，这同样是机械的、非辯証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經濟机构中的扰乱，如果危机延迟了，这个机构显然能圓滑地發揮机能。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的“扰乱”，如果硬要說是

“扰乱”，不如說，它是整个資本主义經濟所不可缺少的、少了就无法进行的扰乱。危机，简单地說来，只有在資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發生，因此是周期地解决生产的无限扩张能力和銷售市場的狹隘限制之間的分裂的完全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實，那么，危机就是資本主义經濟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現象。

在資本主义生产的“无扰乱的”前进过程中，倒不如說，包含着一种比較危机还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潤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換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潤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資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資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結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資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資料变得便宜和使活动中**的**資本有一部分停頓下来，恰恰是它倒起了提高利潤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資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地盤。所以，危机好像是使資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延迟，如果不是指我們說过的世界市場成长中的一定时期的事，而是指單純的延迟，那么，不是伯恩斯坦所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資本主义經濟兴旺，相反，倒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成为整个适应論的特色的机械理解方法，使伯恩斯坦既看不到危机的必不可缺，也看不到中小資本周期地重新萌发起来的投資也是必不可缺的現象，因为这样，在他和另外一些人看来，小資本的不断重生是資本主义停頓的标志，倒不是如实际情况那样是正常的資本主义发展。

当然，是有这么一个立場的，从这个立場看來，上面所講的一切現象实际上也表現得象“适应論”所总结的那样，这就是个別資本家的立場，因为經濟生活的种种事实是由競爭規律改变

了形状进他意識中去的。个别資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經濟過程的每个有机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还有，他只从它对他——对个别資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單純的“扰乱”或單純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資本家來說，危机实际也只是扰乱，而危机的延迟讓他延长寿命；对他來說，信用同样是使他的不够用的生产力“适应”市場需要的手段，对他來說，他所參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取消了生产无政府状态。

总之，伯恩斯坦的适应論不过是个別資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論概括。但是，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論表現上究竟同資产阶级庸俗經濟学的精神和特点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派在經濟學上的一切錯誤，其根源正在于把个别資本家眼中看到的竞争現象当作資本主义經濟整体的現象。例如，伯恩斯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經濟学也把貨币当作巧妙的对市場需要的“适应手段”，它也是从資本主义現象本身去寻求資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藥，它同伯恩斯坦一样相信調節資本主义經濟的可能性，最后，归根結底，它还是同伯恩斯坦的理論一样，是緩和資本主义矛盾和粘合資本主义的創傷的，用另一种說法，就是一种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个空想。

因此修正主义理論，整个說来，可以用这样的話來表現出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經濟学的精神以資本主义停滞論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論。

第二部分^①

一 經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无产者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經濟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个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所梦想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伯恩斯坦否認在現在社会中存在着有这种社会主义的經濟前提。在这个問題上，他在自己的論証中經歷了一个有趣的发展。开头，在“新时代”报上，他是否認工业集中的迅速，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企业統計結果的对比。为了利用这个結果来达到他的目的，他躲进了純粹是簡略的和机械的处理方法中去了。但是，伯恩斯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頑强性的提示，即使在最順利的情况下也絲毫不能損傷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因为，这个分析既沒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也就是說社会主义最終目的實現的一定期限作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条件，也沒有把——我們已經指出过——小資本的絕對消失或小資产者的絕對消失作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条件。

伯恩斯坦，在他的觀点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新的證明材料，这就是股份公司統計，他以为統計表明了股东

^① 这是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書的書評，該書由斯图加特第茲書店于1899年出版，是从1899年萊比錫“人民报”翻印的。

在不断增加，因此资产阶级不是缩小而是相反地扩大了。伯恩斯坦多么不認識这些資料，多么不懂得为自己利益运用資料，真是可惊！

如果他真是想用股份公司證明什么违反馬克思的工业发展規律的东西，他該用别的数字才好呵。每一个知道德国股票發行情况的人，都知道平均到每个企业的創業資本，几乎是一貫減少的。这种資本，1871年約1080万馬克，1871年^①只有401万馬克，1873年380万馬克，1883—1887年不到100万馬克，1896年只有56万馬克，1892年62万馬克，从那时以来，數額在100万馬克上下摆动，并且它又从1895年的178万馬克降到1897年9月1日的119万馬克了。^②

可惊的数字呀！伯恩斯坦說不定会用这些数字組成一个完全反馬克思的、由大企业回头过渡到小企业的趨勢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答复他說：如果你想用这統計證明一些什么，那么你必須首先証明，这些統計指的是在同一个工业部門中現在小企业代替了原来的大企业，而小企业不是出現在到现在为止只有个人資本甚至作坊和細小企业的地方。他是无法作这样証明的，因为从建立巨大股份公司过渡到建立中型、小型股份公司，只能用股票业务不断进入新的部門来解释，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它只适用于少数巨大企业，現在越来越适用于中等企业，有些地方并且适合于小企业了。（用1000馬克以下資本建立的股份公司也出現了！）

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政治經濟方面有什么意义呢？它表示在資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的往前发展，不仅大生产

① 此处原書两者都作“1871年”，疑有誤。——譯者

② 見博尔希特“政治科学手册”第一卷。

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的生产也社会化了；因此，这些情况，不是同馬克思的理論相矛盾，倒是这个理論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輝煌的証明。

确乎如此！发行股票这种經濟現象的內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把許多个小的貨币財产联合成一个生产資本，另一方面，是生产从資本所有权脱离，因而，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仍然是在資本主义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伯恩斯坦提出的統計中，参加一个企业的股东数目很大，这个事實說明什么呢？这不过是說明，現在一个資本主义企业，不象从前那样相当于一个資本所有者，而是相当于大批的、人数不断增加的資本所有者，因而，“資本家”这个經濟范畴，不再是指一个人，今天的工业資本是一个集体，是由几百甚至几千人組成的，“資本家”这个范畴本身在資本主义經濟框子里变成社会的了，它社會化了。

情况既然如此，而伯恩斯坦却把股份公司这个現象恰恰相反地理解为資本的分散，而不是理解为資本的集中，在馬克思認為是“資本所有权的揚弃”^①的地方，伯恩斯坦看到的是資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庸俗經濟学的謬誤来解釋：因为伯恩斯坦把資本家不是理解为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經濟单位，而是一个納稅单位，他把資本不是理解为一个生产整体，而是簡單的貨币財产。因此他在英國紡綫托辣斯中不是看到 12 300 人合而为一，而是看到整整 12 300 个資本家，因此，在他看来，他的工程师休爾茲也是个資本家，因为他从年金領受者摩勒尔得到“一笔数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557 頁。——譯者

目較大的股票”作他妻子的妝盒(見第54頁),因此,在他看來,全世界密密麻麻地一大片都是“資本家”^①。

但是,这里也同別处一样,庸俗經濟学的謬論只是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理論基础。当伯恩斯坦把資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了財产关系中去,“不談企业主而談人們”(第53頁)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問題从生产范围搬进了財产关系的范围,从資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了富者和貧者的关系中去了。

这么一来,我們就被他巧妙地从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帶回到死囚犯的福音的作者威特灵这边来了,区别只在于威特灵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正是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貧富对立中認識到阶级对立,想把它作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斯坦相反,他是在化貧为富、即抹煞阶级对立中,因而在小資产阶级的手法中去看社会主义的前途。

自然,伯恩斯坦不是限于收入統計。他还端出企业統計,并且是許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國、瑞士、奧国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什么統計呀?这不是什么每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得出的可以比較的材料,而是不同各国各有一个时期的材料。它不是

^① 注意! 伯恩斯坦显然認為,小股票的大量推广是社会财富已經开始把它的股票之福降于細民的證明。实际上,除了小資产者或者甚至工人以外,誰還去买例如一分尼或20紙馬克的股票这样的小东西呢? 可惜的是,这个假定是根据一个錯誤的計算来的;他用了股票的票面价值,不是用它的市場价值,而这是两回事。举个例子! 在矿山市場上,除了其他以外,有南非洲的邊区矿山股票交易,股票大部分票面价值是1分尼即20个紙馬克。它的价格在1899年已經是43分尼(見三月底行情表),即不是20馬克而是860馬克! 一般情况平均都是如此。因此,“小”股听起来虽然很民主,实际上是殷实的資产阶级的“对社会财富的票据”,而决不是小資产者或者甚至是无产者的,因为按照票面价值能取得这种股票的人,在全部股东之中只占极小部分。

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組成情形作比較(德国除外, 他把德国 1895 和 1882 年情况的对比又提了出来), 而只是把不同各国的絕對数作比較(英国是 1891 年的, 法国是 1894 年的, 美国是 1890 年的, 諸如此类)。他得出的結論是, “如果說大企业今天事实上在工业中已經占优势, 那么, 把依靠它的企业一起計算进去, 就是在普魯士这样先进的国家中, 最多只代表生产人口的一半”, 在整个德国, 在英国、比国等等情况大致一样(第 84 頁)。

他用这种办法来証明的, 显然不是經濟发展的这个趋势或那个趋势, 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不同行业的絕對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就証明了社会主义沒有前途, 那是因为这个証明有这样的理論作根据, 就是, 决定社会斗争的結果的, 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比, 因而是單純的暴力因素。伯恩斯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 这里他自己却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的錯誤。当然, 这里也还有一个区别: 布朗基主义者是个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派別, 他們認為, 社会主义在經濟上可以实现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暴力革命的前途, 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 但是, 伯恩斯坦相反, 他根据数量上达不到人口多数的事实, 得出了社会主义沒有前途的結論。社会民主党既不是从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中, 也不是从多数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中, 而是从經濟必然性和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認識中, 得出它自己的最終目的的。这种必然性是引导到人民群众消灭資本主义的, 而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現在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上。

說到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問題, 即資本主义經濟无政府状态的問題, 伯恩斯坦自己只否認大的、普遍的危机, 而不否認

局部的、个别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只是否認很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承認有一点无政府状态存在。在伯恩斯坦手上，资本主义經濟的情况就象——马克思有一次說过——那个怀了孩子的傻处女一样，孩子“不过是那么一点呀”。問題的严重是在于在这样的象无政府状态的事情上，一点和很多是同样糟糕的。如果伯恩斯坦承認有一点无政府主义，那么，商品經濟的机构会自动地留心讓这点无政府状态发展到非常之大，——直至崩溃。但是，如果伯恩斯坦——在保持商品生产的同时，——希望把这一点无政府状态也逐步地化除在秩序和协调之中，那么他又犯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錯誤，因为他把交换方式看成了不依生产方式为轉移的东西。

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的惊人的混乱，要把它全盘指出，这里不是适当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原理有关，我們要在这里說明一下。

伯恩斯坦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規律純粹是一个抽象，在他看来，那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話。但是，如果说劳动价值只是一个抽象，“一个想象”(第 44 頁)，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納了稅的有权的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談調制成这样的一个“想象”，即也来調制一个价值規律。“当然，马克思有权把商品的屬性忽略到这样程度，直到商品最后只剩下一个简单人类劳动的結晶，正如奥地利学派 (Böhm-Je-vonssche Schule) 有权把商品的一切屬性，除商品的效用以外，都抽象掉一样”(第 42 頁)。

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門格尔的抽象效用，正如半斤对八两，都是純粹是抽象。可見，伯恩斯坦已經完全忘記了，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馬

克思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經濟中，是現實的社会存在，現實到可以拿来剪和錘、秤量和鉛印。馬克思發現的抽象人类劳动不是别的，就是在它发达的形式上成为貨币的东西。这恰恰是馬克思天才的經濟发现之一，而对于整个資产阶级經濟学，从最早的重商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貨币的神秘本質一直是本不可理解的天書。

相反，奧地利學派的抽象效用，倒事实上是一个想象，或者宁可說，是思想貧乏的写照，是一种个人的愚蠢，既不能由資本主义社会、也不能由任何别的社会来負責，唯一應該負責的是資产阶级庸俗經濟学。伯恩斯坦、庞巴威和吉逢士同整批主观主义的一群，头里装着这种“想象”，就是在貨币的神秘面前再站二十年，也得不到别的解决办法的，就是沒他們，連每个皮鞋匠都早已知道貨币也是一种“有效用”的东西了。

由此看来，伯恩斯坦对于馬克思主义的价值規律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凡是对馬克思經濟学說体系有几分相信的人，不用多說就明白，如果沒有价值規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說，如果不懇商品和它的交換的本質，整个資本主义經濟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必然是一个謎。

但是，馬克思的魔鑰是什么呢？是什么为他打开了一切資本主义現象的最深奥的秘密的呢？是什么使他能够輕易地解决了連斯密和里嘉图这样的資产阶级古典經濟学大师都沒有料到存在的問題的呢？不是别的，就是把資本主义經濟当作一个历史現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象古典派經濟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封建經濟的过去，并且特別是也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馬克思的价值理論、貨币分析、資本理論、利润學說以至整个經濟学說体系的秘密是——資

本主义經濟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此是——这不过是另外一面——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正因为并且只因为馬克思事先就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資格，就是說，用历史的觀点去觀察资本主义經濟，所以他能够解释它的象形文字，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立場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所以他反过来能够科学地創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这方面，我們得估量一下伯恩斯坦在他的書的結尾駁“二元論”的一段話。“有一种二元論貫穿着馬克思的整部宏伟的著作，这就是，这个著作是科学研究，却又要証明早在起稿之前就已完成的一个論題，就是，在著作所依据的草图中，應該从发展中达到的結論，事先已經確立了。这里，回到共产党宣言（即回到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就是表示实际上有馬克思意義上的空想主义残余存在。”（第177頁）

但是，馬克思的这种“二元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論，資本与劳动的二元論，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論，它是資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二元論——即資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

当伯恩斯坦把馬克思的这个理論上的二元論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那么，这不过是一张坦白的供状，說明他否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存在着的二元論，否認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說明社会主义本身对他已經变成“空想主义的残余”。伯恩斯坦的一元論是永存的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元論，是放弃了自己的最終目的、却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資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的終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元論。

但是，如果伯恩斯坦在資本主义經濟結構本身中看不到分裂，看不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那么，为了至少在形式上挽

救住社会主义綱領，他就不得不求救于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的结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則”。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該用来裝扮自己的、伯恩斯坦的“合作原則”，这个社会主义最終目的的最稀薄的“提煉物”(Abkläracht)，不是他的資产阶级理論对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讓步，而是他的資产阶级理論对于——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的讓步。

二 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我們已經看到，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归結起来是一个讓工人分沾社会財富、变貧者为富者的計劃。这怎么实行呢？在他发表在“新时代”报上題为“社会主义問題”的一批論文中，伯恩斯坦讓別人只瞧到一点几乎难于理解的暗示，而在他的書里，对这个問題就提出了完整的綫索：他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两条道路实现，即通过工会——用伯恩斯坦的称呼叫做——經濟民主，及通过合作社。他想通过第一条路抓住工业利潤，通过第二条路抓住商业利潤。

說到合作社，并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那么，就其本質說，是資本主义經濟內部的二重物，是在資本主义交換之下的一种小規模的社会主义生产。但是，在資本主义經濟中，交換統治着生产，面对竞争，使得肆无忌憚的剥削，也就是使得生产過程的完全听命于資本的利益，成为企业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必須尽量使劳动紧张，必須完全依照市場情況来縮短或者延长劳动時間，必須完全依照銷售市場的要求吸收劳动

力或者辞退劳动力，把他們拋到街道上去，总而言之，必須运用大家知道的一切办法使一个資本主义企业能够和別人競爭。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向劳动者提出了充滿矛盾的条件，他們必須用完全必要的絕對主义来管理自己，他們必須对自己行使資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生产合作社遇到这种矛盾也就垮了，因为，或者它倒过头来变成資本主义企业，或者，遇到工人的利益較強的时候，它就瓦解。这种事实，伯恩斯坦本人也証实过的，但是他把它理解錯了，他跟着韦伯夫人，以为英国生产合作社的所以垮台是由于缺乏“紀律”。在这里肤浅地称为“紀律”的东西不是別的，正是那自然发生的、絕對的資本制度，工人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制度用在自己身上。^①

由此可見，生产合作社要在資本主义經濟中存在下去，只有采取曲折的道路，巧妙地逃避了自由競爭的規律，消除了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的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它要能够这样，又只有在它事先为自己保証了一个銷售市場、保証了一批可靠的消费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当作这种輔助手段替它服务的，正是消費組合。伯恩斯坦研究为什么独立的生产合作社会垮台，要有消費組合才能保証它存在下去，这个秘密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購銷合作社的特征，或者如奧本海瑪曾經想过的那样。

但是，在今天的社會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是同消費組合的存在条件結合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得出这个結論，就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最順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小量

^① “工人的合作工厂，在旧形态內，虽然它必然在它的現實組織中当然地把現存制度一切缺点处处复制出来，却是旧形态的最早的破坏。”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62頁。

的地方銷售和小量的直接必需品——主要是生活資料——的生产。一切最重要的資本主义生产部門：如紡織、煤炭、金屬、石油、机器、機車和造船工业，是消費組合所容納不下的，因而一开始就是生产合作社所容納不下的。所以，就算不說生产合作社的二重性，如果把生产合作社普遍实行起来，它首先預定着要取消世界市場，拆散現今存在的世界經濟，而把它变成小規模的、地方性的生产和交換的团体，因而就本質上說，是从大規模的資本主义經濟退回到中世紀的商品經濟去。

但是，生产合作社，在現今社会的基础上，那怕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它也必然不过是消費組合的附屬品，消費組合站在前列，代表着想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改良的支柱。因此，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資本的斗争，即反对資本主义經濟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資本的斗争，并且是反对小商业資本、中等商业資本的斗争，就是說，不过是反对資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小桠枝的斗争。

至于工会，照伯恩斯坦看来，它應該是反对生产資本剥削的一个手段。我們已經指出过，无论在生产范围方面或者在生产的技术方法方面，工会都不能使工人影响生产过程。

至于純粹經濟方面，即伯恩斯坦所謂“工資率和利潤率的斗争”方面，我們已經同时指出过，这个斗争不是在自由的兰色天空中进行，而是在工資規律的一定的界限內进行的；这个斗争不能打破工資規律，只是使工資規律实现。如果人們把事情从另一方面来看，問問自己工会固有的职能是什么，那么，这一点也就明白了。

伯恩斯坦認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工会要向工业利潤率作真正的进攻，把它逐步化成工資率。但是，工会是没有能

力采取反对利潤的經濟进攻政策的，因为工会不过是工人力量的有組織的防禦，是防止利潤的进攻的，是工人阶级防御資本主义經濟的下降趋势的。理由有二：

第一，如果说，工会有通过自己的組織去影响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市場情况的任务，但是，由于中間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新商品不断涌入劳动市場，組織就不断地被打破。第二，如果说，工会的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享受的社会財富的份額，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象一个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一样，我們是在不断地降低这个份額。后面这一点，无須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才看得到，只要手上有一本洛貝爾图的社會問題說明就行了。

因此，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經濟职能上，由于資本主义社会的客觀過程，变成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①。但是，如果劳动者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場情況他應該得到的工資，如果資本主义工資規律要實現，如果要麻痺、或者說得确切些，是減輕經濟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西西法斯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如果人們要把工会变成逐步減少利潤增加工資的手段，那么首先要有一个社会条件作前提：第一是中間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提高，两种情况，也如消費合作社經濟的實現一样，是回到大資本以前的状态。

由此可见，伯恩斯坦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合作社和工会，証明是完全无法改造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点，基本上連伯恩斯坦本人也模模糊糊地意識到的，他把它們只

^① 西西法斯 (Sisyphus)——希腊神話中，西西法斯是哥林多的王，被罰在冥府运巨石到山頂，石又滾下山坡，又得再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結果。

是当作摘去一些資本主义利潤并用这样方法讓工人变得富些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向，轉向反对資本主义分配的斗争。伯恩斯坦反复地把他的社会主义說成是爭取“公平的”、“較公平”（他的書上第 51 頁）、还有“更公平的”（1899 年 3 月 26 日序）分配。

資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当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因此，社会民主党在为了使全部经济社会化而斗争时，当然也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是，根据馬克思深入理解的結果，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分配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自然的、合乎規律的后果，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資本主义生产框子里的分配，而是要废除商品生产本身。总之，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的分配，而伯恩斯坦的方法正相反，他想反对資本主义的分配，并希望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資本主义生产的一定的发展趋势嗎？当然不是，因为，第一，他根本就否認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希望达到的生产的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結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因。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經濟的原因。在他顛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經濟关系之后，他不能給他的綱領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論据，他被迫着要抓一个唯心主义的論据。

于是我們听见他說：“社会主义究竟为什么要从經濟的必然性中得出来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的作用呢？”（1899 年 3 月 26 日序）因此，伯恩斯坦的公平分配

靠什么来实现呢？靠人类的自由意志，自由发挥作用的、不服从科学必然性的自由意志，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靠对于公平的判断，——因为意志本身也不过是一个工具，——总之，是靠公平观念。

好了，我們幸运地找到了公平原則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們，在缺乏可靠的历史的促进手段时都騎过这匹跑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 (Rosinante)，历史上所有的唐吉訶德 (Don Quichotte) 都騎着它出去干过伟大的改造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一只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沒有带回家来。

把貧富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合作“原則”作为社会主义的內容，把“公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公平觀念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历史身份証書——这一种社会主义，五十多年前威特灵曾經主张过，并且有力得多，聪明得多，光輝得多！不过无论如何这位天才的裁縫那时还不知道有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說，今天，在半个世紀之后，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撕得粉碎的威特灵的觀点竝幸运地被重新綴补起来，当作科学的最新发现獻給德国无产阶级，那么这件事情，大約也要归功于一个裁縫——但决不是天才的裁縫。

* * *

如果工会和合作社是修正主义理論的經濟支点，那么，这个理論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是民主的不断往前的发展。今天的反动高潮在修正主义看来不过是“痙攣”，是暫时的，偶然的，在制定工人斗争的总方針时不必加以考虑的。

例如，在伯恩斯坦看来，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驟，不錯，在他看来，正如資產阶级自由主义理論家看来

一样，民主是一般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的实现必定是为政治生活中所有一切发生作用的力量服务的。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把最近 25 年或 30 年来资产阶级发展的细小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是肤浅的夸张吧了。如果看一看民主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仔细观察一下资本主义政治史，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果。

关于前者，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古代奴隶国家，在中世纪的城市公社中，都看到有民主。正如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遇到专制和君主立宪一样。就另一方面说，资本主义在初期——在商品生产时——在城市国家中引起了一个民主宪法；后来，在它比较发达的形式上，作为工场手工业，它却把君主专制当作它的适当的政治形式。最后，作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它在法国一个又一个地产生了：民主共和国(1793)，拿破仑第一的君主专制，王政复古时期的贵族政治(1815—1830)，路易·菲力普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后来又是民主共和国，又是拿破仑第三的君主制，最后第三次又成立共和国。在德国，唯一的实际的民主制度——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一个在政治上把许多小国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上有意义，他们过去对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还表示满意的呢。在俄国，资本主义是长期在东方式的专制政治下成长的，资产阶级没有露出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国，普选权大部分是当作这个四分五裂的王国的救生圈来用的。最后，在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民主成果——普选权——无疑地同军国主义不强有关系，因而同比利时的特殊地理政治条件有关系，首先，它不是由资产阶级争来的，而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得来的“一点儿民主”。

由此可見，仔細觀察下來，民主的不斷高漲，——修正主義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一樣，以為這是人類歷史的根本規律，至少是現代歷史的根本規律，——原來是空中樓閣。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主之間，不可能構成普遍的、絕對的關係。無論什麼時候，政治形式都是全部國內外政治因素的總和的結果，在政治範圍內，可以有一切層次，從專制君主直到民主共和國。

因此，就是在現代社會範圍內，我們也只有不管那民主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而專門注意資本主義歷史的現階段，這樣，我們就看到，就是在此地，在政治形勢中包含着的因素，也不是有利于實現伯恩斯坦的計劃的，恰恰相反，倒是有利于犧牲資本主義社會到現在為止的成果的。

一方面，民主制度曾經對於資產階級的發展起過重大作用，——這一點非常重要。在它對於小國的相互結合和現代大國的建立必不可少的範圍內（德國、意大利），經濟發展在當時帶來了內在的有機結合。

在整个政治的、行政的國家機構由半封建或封建機構變成資本主義機構的改造上，情況也是一樣。這個在歷史上同民主不可分離的改造，今天已經達到這樣的高點，國家機構中的純粹民主成分，普選權和共和國的形式，已經可以告退，無須行政、財政和國防等等回到三月革命以前的形式。

如果說，由於這種情況，自由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基本上是多餘的了，那麼，另一方面，在有些重要方面，它已經直接成為障礙物。這裡有兩個因素要考察，這兩個因素恰恰是支配著當前國家的整個政治生活的：世界政策和工人運動，——兩者不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現階段的兩個不同的方面。

世界經濟的形成，世界市場上競爭戰的尖銳化和普遍化，使

得作为世界政策的工具的陆海軍国主义，在大国的无论对外生活和内部生活方面，都成了关键性的要素。既然世界政策和軍国主义是现阶段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么，資产阶级民主的走下坡路是势所必然的。在德国，大规模扩充軍备的时代是从1893年开始的，同占领青島同时树立起来的世界政策，立即从資产阶级民主方面收了两份献礼：自由主义的垮台和中間派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最近的1907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殖民政策旗帜下格斗过来的，这次选举同时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坟墓。

如果对外政策把資产阶级投入了反动的怀抱，那么对内政策也并不差些，它把力求上进的工人阶级也投入反动的怀抱。伯恩斯坦自己承認了这一点。他說，社会民主党的“貪吃”——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要替自由資产阶级的逃兵行为負責。接着他劝告无产阶级，为了把吓死了的自由主义再从反动的耗子洞里引誘出来，應該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他今天取消为生活条件和为資产阶级民主的社会前提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样，他自己就最明显地証明：正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今天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的产物，民主在同一程度上与这个趋势发生着矛盾。

但是他借此还証明了一件事。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終目的作为重新喚起資产阶级民主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也就表明了：反过來說，資产阶级民主多么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里，伯恩斯坦的推理陷入循环邏輯，最后的結論“貪吃”了它的第一个前提。

要摆脱这个循环邏輯，事情很简单：資产阶级自由主义在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終目的的面前吓得魂飞天外，根据这个

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在今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恰恰是并且能够是民主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資产阶级民主身上，相反，倒是民主发展的命运寄托在社会主义运动身上。民主的活跃程度，不是与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成比例，而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資产阶级逃兵行为的反动后果而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坚强成比例。誰希望民主强大，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軟弱，而放弃了社会主义斗争目标，就既放弃了工人运动，也放弃了民主。

三 夺取政权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的命运寄托在工人运动的命运身上。但是，民主的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使得在掌握国家政权和夺取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多余的事，或者不可能的事呢？

伯恩斯坦用彻底衡量合法改良和革命的优点和缺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問題。他优游自在地衡量着，叫人想起消費組合中秤肉桂和胡椒的样子。他看到，在合法的发展过程中，是理智用事，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是感情用事，在改良工作中，是历史前进的緩慢方法，在革命中，是历史前进的急速方法，在立法中，是有計劃的方法，在革命中，是原始的暴力(第183頁)。

由來已久了，小資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上总是看到“优点”一面和“缺点”一面，对每一个花坛都津津有味。但是，同样也是由來已久了，事物的实际进程很少关心小資产阶级的各种推測，精心搜集来的一堆世界上一切可能事物的“优点”碰碰就烟消云散。实际上，我們在历史上看到，合法改良和

革命所起的作用，有比这个或那个方法的优点、缺点更为深刻的根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上，合法改良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直到它感到充分成熟，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全部现存的法权制度，以便建立一个新的法权制度为止。伯恩斯坦反对夺取政权，把它当作布朗基主义的暴力理论来咒骂，不幸的是他把千百年来成为人类历史的关键和动力的东西当作布朗基主义的计算错误。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始点和终点。这种情况，我们在古罗马农民同货币资本家和贵族的长期斗争中，在中世纪贵族同主教的斗争和手工业者同贵族的斗争中，在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都可以见到。

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象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盆一样可以由人任意加以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不同要素，它们既是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并且，每一个时候的法制都只是革命的一个产物。如果说，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立法就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继续成长。合法改良工作，就它本身来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离革命而独立的动力，它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它的刺激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或者，具体地说，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树立的社会形态的框子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以为合法改良工作不过是放宽了的革命，以为革命不过是压紧了的改良，那是根本错误的想法，完全违反历史。社会革命

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要素，不是時間长短不同，而是本質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單純的量变轉为新質，具体地說，正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會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會制度。

因此，如果誰把合法改良的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主张用前者代替后者，那么，他事实上选定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一个比較温和、稳当和緩慢的道路，而且也是选定了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无关紧要的变动。所以，从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同从它的經濟理論一样，得出同样的結論，就是，根本上說，修正主义不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資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爭剝削的多些或者少些，总之，它是为了消除資本主义的贅疣，而不是为了消除資本主义本身。

上面所說的关于合法改良和革命的話，或許只是对到现在为止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吧？或許，从今以后，由于資本主义法制的成熟，合法改良可以担负起这样的責任，把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引导到另一个，而无产阶级的夺取国家政权，如伯恩斯坦在他的書里第183頁所說的那样，“变成无內容的空話”了吧？

情况恰恰相反。資本主义不同于以前的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和中世紀社会——的特征的是什么呢？正在于：現在的阶级統治不是以“既得权利”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經濟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純粹的經濟关系。在我們整个法制中，找不出現在的阶级統治的法律規定。如果还找到一些这样的規定，那么，它恰恰是——如佣仆規則——封建关系的遺物。

既然雇佣奴隶制度在法律上完全沒有表現出来，又怎么“通过合法的道路”逐步地予以废除呢？想靠合法改良工作替资本主义准备一个結束的伯恩斯坦，落在烏斯宾斯基說过的那个俄罗斯巡警的地位上了，巡警叙述他的冒险故事說：……“我一把抓住那家伙的領子，結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是沒有領子的！”……麻煩就在这里呀。

“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①，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过去阶段上，这个对立，曾經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上表現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一定程度为止，新兴的关系还可以在旧关系的框子內找到地盘。“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② 怎么做的呢？通过在城市郊区逐步废止那一切零零碎碎的、总起来构成农奴制度的权利，如徭役、选畜权、衣着权、借地繼承稅、人头稅、强迫婚姻、遗产公享权之类。

小資产者也下过类似的工夫，“封建专制制度铁蹄下的小資产者曾能掙扎到資产者的地位”。^③ 用什么办法？通过局部地正式废除行会的束縛或者事实上解脫行会的束縛，通过逐步地在最紧要的范围内改造行政、財政、国防制度。

所以，如果抽象地研究問題而不是历史地研究問題，那么，在以前的阶级关系情况下，至少可以設想純粹通过合法改良的办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事实上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在那时候，合法改良也不是使資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替夺取政权作了准备和引导。无论为了废除农奴制度，无论为了废除封建制度，真正的政治社会革命那

① ② ③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頁。

时都是必不可缺的。

但是，現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强迫无产阶级受资本奴役的，不是任何法律，而是必需，是缺乏生产資料。可是世界上沒有任何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够宣布生产資料屬於他們，这是因为他們也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經濟的发展，被剥夺了生产資料的。

其次，在雇佣关系內部的剥削，同样也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因为工資的高低不是由法律的途径而是由經濟因素所决定的。剥削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依据一种法律規定，而是依据这样的經濟事实：——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場，它除其他特性以外有一个令人滿意的性質，就是它能生产价值，并且生产的价值比較它自己在工人生活資料的形式中消耗的价值还多。总之資本主义阶级統治的根本关系，是不能用資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合法改良的手段来改变掉的，因为这些关系既不是由資本主义的法律带来的，而它們的形式也不是从这种法律得来的。伯恩斯坦在訂定社会主义“改良”計劃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所不知道的，就是他自己說了的，因为在他的書里第 10 頁上写着：“經濟动机，在从前用种种色色的統治关系和思想体系包藏着的地方，現在是无拘无束地登場了”。

但是还得加上第二个。資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們不是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对社会主义疏远。在生产中，社会性越来越表現得明白。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大企业、股份公司、卡特尔，这里，資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的情况发展到最高点。

在国防上，义务兵役制有了推广，服役期限縮短了，因而就

物質方面說向人民軍隊接近了。但是，这是采取現代軍国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人民的受軍事国家所統治、国家的阶级性質，最鮮明地表現出来了。

在政治关系上，民主有了发展，民主是最有利于所有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园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国家”发展。但是，民主采取了資产阶级議会制度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阶级对立、阶级統治沒有被废除，倒是开展和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見，因为整个資本主义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所以，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內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資本主义的外壳里挖出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資本主义制度。

伯恩斯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結論：如果說，民主的发展是使資本主义的矛盾尖銳化而不是使它緩和，那么，他答复我們說：“社会民主党如果不給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倒是應該尽力去破坏社会改良和破坏民主措施的扩大了”(第71頁)。不錯，如果社会民主党还学小資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优点、抛弃一切缺点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話。不过，它后来势所必然地对整个資本主义制度也要“尽力去破坏”，因为这个制度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在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布下重重障碍。实际上，資本主义除了布下障碍以外，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綱領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民主方面也完全适用。

如果說，对于資产阶级，民主一部分已經变成了多余的，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正因为这样，对于工人阶级，它就成为必要的、不可缺的。首先，民主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之类），在无产阶级改造資本主义社会时，对无

产阶级起了跳板和支点的作用。其次，民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中，在为民主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識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任务。

总之，民主是少不得的，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的事，相反，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既成为唯一可能的，并且同样成为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他論述的——从序言的每一行都看得清楚——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的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子內他的态度的问题。总之，恩格斯是对被統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了准繩。

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問題的著名发言則相反，——伯恩斯坦同样引了它的一段話：“如果对地主实行贖买，或許是最便宜的”，——这里所講的不是无产阶级在它胜利之前的态度，而是指胜利之后。因为显然只有工人阶级已經掌了舵才說得上对統治阶级的“贖买”。而馬克思在这里当作可能性拿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沒有怀疑过。到伯恩斯坦，才把资产阶级議会制度的鷄峙，当作負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的机关。

不过，伯恩斯坦讓他的理論純粹从忧虑和警告开头，——无产阶级可不能太早地取得政权呵！在这种情况下，照他看来，只有讓资本主义的現状完全維持下去，即使我們遭受一次可怕的

失敗也好。我們从这种忧虑中首先看出了什么呢，那就是，如果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伯恩斯坦的理論对于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实际指示——躺着睡觉吧！因此，这个理論沒有指出更多的东西，只是提出了一个觀点，注定了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只該坐着不动、消极地背叛自己的事业。

我們的整个綱領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紧要关头和时机为我們服务，并且是通过它的运用而不是不运用为我們服务，实际上就是一张倒霉的廢紙。我們的綱領如果真是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表述，那么，必須在基本輪廓上表述这个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因而它也就能够向无产阶级指出，在每个时机如何为着使社会主义早日到来而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來說，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时一刻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綱領，或者他被这个綱領所放弃。

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表現的，由于事态的发展，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沒有任何一个时刻不可能或者不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他的綱領、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定措施的。如果認為社会主义綱領可以在某一刹那間完全不提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事，可以对它的实现完全不作指示，那么，在这种主张背后就不自觉地藏着另外一个主张，就是說，社会主义綱領根本是什么时候都实现不了的。

要是过渡措施采取得过早了呢？——在这个問題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变革的現實过程的一大堆錯誤認識。

国家政权的由无产阶级掌握，就是說由一大批人民群众来掌握，首先不要認為这是可以用什么人工的方法造成的。它是以經濟政治情況的一定的成熟程度为前提的。——我們不說象巴黎公社这种場合，那里，政权的归到无产阶级手中，不是他的

目标明确的斗争的结果，而是作为例外的情况，作为谁都不要的无主的财货现成得来的。——这是它同布朗基主义的政变根本不同的地方。布朗基主义主张由“坚决的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象从手枪发射的一般，正因为如此，它总是不合时宜的。由广大的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本身只能是已经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崩溃的产物，因此，本身就带着及时出现的经济政治合法证书。

因此，从社会前提的角度上来看，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完全不会“过早”发生的。可是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的角度上看，就是说，从政权的巩固来看，它却必然是“过早”地发生的。使伯恩斯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象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战栗和恐惧都毫无用处。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象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认为这也是可能的，那又是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他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

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决定的。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夺取政权，因为它无条件地必须作一次或几次的“过早”的夺取，才能有最后的、持久的掌握。因为如此，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道通罗马，我们从这一方面也是必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方针，结果也就是放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

四 崩 漏

伯恩斯坦修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的。但是，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斯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在辩论过程中，为了支持他的第一个主张，他就把社会主义的阵地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

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

但是，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想到改良商业和消费组合。

但是，通过消費組合来改造社会，哪怕还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實上的物質发展是不相容的，——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了唯物的历史觀。

但是，他的經濟发展過程的觀點是同馬克思的剩余价值規律不相容的，——于是，伯恩斯坦放弃剩余价值規律和价值規律，从而放弃了卡尔·馬克思的全部經濟理論。

但是，沒有明确的目的和沒有在現今社会中的經濟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斯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

但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伯恩斯坦在进一步的結論中，甚至反对說在我們的社会里有阶级存在：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群不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且在經濟上都是四分五裂的个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也不是靠內在的經濟利益結合起来的，而只是由于外来的压力——从上来的或者从下来的——在政治上結合起来的。

但是，如果沒有阶级斗争的經濟基础，并且根本上說也沒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将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它們到現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身和它的后果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事了。或者，如果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它同样只是政治压力的結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倒是霍亨索倫方針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兒子，倒是反动所生的私生子。这样，由于不由自主的邏輯，伯恩斯坦从唯物的历史觀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音报”的觀点上去了。

在坚决地全盤否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批判之后，剩下的路：只有滿意現状了，至少在总的方面表示滿意。对

于这一点，伯恩斯坦倒也并不退缩，他觉得現在德国的反动并不那么厉害，“在西欧各国，政治上的反动看到的不多”，几乎所有西方各国“資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而不是鎮压”(見 1899 年 3 月 26 日“前进报”)。工人不是貧困了，而是相反，他們越来越富裕了，資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健康的，不見有反动和压迫，——在这所有世界最好的一个世界中，万事万物都走向最好的境界……

就是这样，伯恩斯坦完全合乎邏輯地从头一貫到底。开始，他为运动的利益放弃了最終目的，但沒有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因此，結尾，他必然把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

因此，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观点全部崩溃了。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馬克思体系建筑物，在他手上，現在变成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破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公墓地。馬克思和蒲魯东，黎峨·封·卜哈和法兰茲·奧本海瑪，弗利特立希·阿尔培·朗格和康德，波罗戈洛維契先生和利推尔·封·紐包威尔，海克納爾和叔尔茲·加維尼茲，拉薩尔和尤利烏士·沃尔夫——所有这些人在伯恩斯坦思想体系中都有片断的貢献，伯恩斯坦把所有这些人都拜作老师。并不奇怪！他抛弃了阶级立場，也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在一个彻底世界觀中結成有机整体的結晶軸。

这个把一切可能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无区别地混堆起来的理論，初看起来倒是毫无偏見的。伯恩斯坦也不願意听到什么“党的科学”，或者正确些說，阶级的科学，也不願听什么阶级的自由主义，阶级的道德。他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

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不同的阶级有正相反对的利益、企图和观点，所以，在社会問題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自由主义、抽象道德，暂时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給伯恩斯坦当作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的东西，只是統治者的东西，即資产阶级科学、資产阶级民主和資产阶级道德。

实际就是这样！当他拒絕了馬克思的經濟学說体系以便效忠于布棱塔諾、庞巴威-耶方斯、薩伊、尤利烏士·沃尔夫的时候，他除了用資产阶级的辯护論来代替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談論自由主义的一般人类性，把社会主义变成它的变种的时候， he除了从社会主义抽去阶级性、抽去历史内容、因而根本抽去了一切内容之外，除了反过来把自由主义的历史代表人、把資产阶级当作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以外，又还能作什么呢？

当他在社会民主党里攻击把“物質因素提高到作为决定发展的万能力量”、攻击“看不起理想”的时候，当他談着理想主义和道德的字句，同时对于无产阶级重整精神的唯一泉源即对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生气的时候，老实說，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資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即向現存制度妥协把希望带到虔誠的理想世界的來生以外，他还能作什么呢？

最后，当他用利箭針對辯証法的时候，除了同努力上进、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特有的思想方法斗争以外，还能作什么呢？他反对的是这把剑，这把剑曾帮助无产阶级砍破黑暗、看清自己的历史的未来。他反对的是这个精神武器，用这武器无产阶级虽然物質上还在羈轭之下但战胜了資产阶级，因为它向資产阶级确实証明，資产阶级的存在是暫时的，而无产阶级的胜利

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精神世界中已經完成了革命！当伯恩斯坦向辯証法告別，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然，但是”、“虽然，可是”、“較多，較少”的思想蹠板的时候，他就完全合乎邏輯地退化到沒落資產階級的、由历史所决定的思想方法中去了，这个思想方法，正是資產階級的社会存在和政治行为的一幅忠实的精神画象。目前資產階級在政治方面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但是”，表現得恰恰同伯恩斯坦的思想方法一模一样，而伯恩斯坦的思想方法是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最細致和最可靠的征象。

可是，在伯恩斯坦看来，現在連 *bürgerlich*^① 这个字也不是階級表現了，而是一般社会概念了。这不过是說明了——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真是絲毫不差——他已經用資產階級的科学、政治、道德、思想方法以至于历史語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科学、政治、道德、思想方法以至历史語言。当伯恩斯坦把 *Bürger*^② 理解为既是資產階級，也是无产阶级，因而无区别地是简单的人的时候，人类社会也就同資產階級社会等同起来了。

五 机会主义的理論和实际

伯恩斯坦的書，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替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建立一个理論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們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我們把一些零碎的表现——如大家知道的汽船补贴問題等——也計算进去，那是早

^{① ②} *Bürger* 原指中世紀城市中自由富裕的中等阶层，*Bürgertum* 与 *Bourgeoisie* 同义，现代社会中指“資產階級”，*bürgerlich* 指“資產階級的”。——譯者

就存在的了。可是，一个公开的統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九十年代之初开始的，是从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垮台后，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勒瑪的国家社会主义、巴威路的預算投票、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海尼的补偿建議案、希伯尔的关税觀点和民軍觀点，这些就是在机会主义的实际的发展中的界标。

机会主义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論”的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們的“理論”，就是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实际活动，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設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們自然企图讓自己的手不受束縛，就是，讓我們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論”，不依据理論。

但是，这个理論，迎头痛击了他們的每一个实际企图：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民軍問題，都是机会主义遭到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它們想反对我們的基本原理，势必向理論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单单裝作不知道；势必想法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一种自己的理論。伯恩斯坦的理論正是向这方面走的一种尝试，因此，我們在斯图嘉特党代表大会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斯坦的旗帜周围集合了起来。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由于我們的斗争条件产生的現象，它的增长是可以解释的現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斯坦的理論也是一个不难理解的企图，它是想把这些思潮在一个普遍的理論表現中总结起来，找出自己的理論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較量一番。因此，伯恩斯坦的理論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論上的耐火試驗，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証書。

这次試驗結果如何呢？我們已經看过了。机会主义树不起一个多少頂得住批評的實証理論。它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先对馬克思學說的各个個別的基本原理进攻，最后，因为这个學說是各部分密切結合的一座建築物，就想把整个學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一起毀掉。由此証明，机会主义的实际上在它的本質上和基础上是同馬克思的思想体系不能相容的。

但是，其次它也証明了，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它的內在的趋势是要把工人运动赶到資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去，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馬克思學說体系——从历史上說——不是一回事。在馬克思以前，并且同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論上表現出适应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意图。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为基礎建立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反对分配方式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貧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經濟的基础上“合作化”的企图，——我們在伯恩斯坦思想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論，过去在它们那时代，尽管它们有一切欠缺的地方，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的理論，它们都是伟大的幼兒学校，无产阶级是在这些学校里学着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經达到脫掉这些理論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論以外就不能再有任何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論上去，現在不再是表示回到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幼兒学校，不是的，

現在這是表示回到資產階級的窄小的破鞋中去了。

伯恩斯坦的理論，是給機會主義打理論基礎的第一個嘗試，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次嘗試。我們說是最後一次，是因為機會主義在伯恩斯坦的理論中，無論消極方面——堅決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無論積極方面——把可以抓得上的一切理論上的混亂堆到一起，都已經走得如此之遠，已經沒有更多的事留着要作的了。伯恩斯坦的書一出來，機會主義在理論上的發展就完成了，作了最後的結論了。

而馬克思的學說，不僅能在理論上回擊機會主義的學說，並且是唯一能够把機會主義當作歷史現象放在黨的發展過程中加以說明的學說。無產階級為達到它的最後勝利的這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進軍，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的事”。這個運動的全部特點，在於這裡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人民群眾自己違反著一切統治階級來貫徹自己的意志，而這個意志必須超過現在社會在未來世界中實現。這個意志，群眾又只有在同現存制度不斷進行鬥爭，在現存制度的框子里養育得起來。廣大人民群眾同一個超越全部現存制度的目的結合，日常鬥爭同偉大的世界改造結合，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大問題，這個運動因此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是在兩塊礁石之間前進：一邊是群眾性的任務，一邊是最後目的的任務；一邊是重犯宗派主義，一邊是滾入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一邊是無政府主義，一邊是機會主義。

當然，馬克思的學說在他的理論武庫中早在半世紀以前已經提供了既反對這個極端又反對那個極端的銳利的武器。可是，正因為我們的運動是一個群眾運動，而威脅著運動的危險不是從人的頭腦而是從社會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因此，那種跳到無政府主義一邊去和跳到機會主義一邊去的現象，不是可以用馬

克思主义理論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它要在实践中降生以后，通过运动本身，当然只有靠馬克思所提供的武器的帮助，才能克服。較小的一个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兒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經把它和“独立运动”一起克服了。較大的一个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現在正在克服。

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很短的一段時間到来，这时关于能否达到伟大目的的怀疑，和关于运动的观念因素的动摇，在运动中抬起头来。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这样而不能是别样，动摇和畏縮的时刻，对于馬克思的学說來說；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馬克思早已看到和預言过的。馬克思在半世紀以前在他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紀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連不断地取得胜利的；在这种革命中間演剧式的效果一个比一个更加眩目，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照耀得灿烂輝煌，每天都充满着乐极狂欢；然而这种革命总是为时暫短，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頂点，而社会在还未冷靜地領略其疾风怒涛时期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宿酒未醒的状态。反之，无产阶级革命，如19世紀的革命，则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临时止住脚步，回复到仿佛已經作过了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极端彻底嘲笑自己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翻到地上，好象只是要讓敌人能从地里吸取新鮮力量和更加强壮地挺立起来；它们畏于自己目标的无限庞大，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庄严地說道：

这里是罗得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

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說已經建立之后，这段話仍然是对的。就是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还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質的，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質，它的变成这种性質的运动，也是在它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两者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要素。

从这一点看來，值得奇怪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說是这个思潮竟如此虛弱。当它仅仅表現在党的个别实际工作上的时候，人家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認真的理論基础。可是現在它在伯恩斯坦的書里已經完整的表达出来了，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觉得奇怪地喊道：怎么，你要說的就是这些了吗？連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沒有！沒有一点思想不是早已在几十年前給馬克思主义踢倒、踏破、嘲笑过的，并且一点也沒有改变呀。

机会主义說了話了，就足够証明它沒有东西好說了。伯恩斯坦的書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实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因而，伯恩斯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辯証法和唯物史觀告別的时候，还可以謝謝它們，因为它們对于他的变化認為还有条件可以从寬发落。因为辯証法和唯物史觀是豁达大度的，它們讓他表現为負有使命而不自觉的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通过这个工具已經把它的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了出来，以便在仔細觀察之后，冷笑着搖搖头发把这种不坚定性从自己方面远远地抛擲出去。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27 頁。

民軍和軍國主義^①

对于我们纲领中的个别要求和我们的策略，从党的队伍中响起批评的音调，这不是第一次，希望也不是最后一次。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那是最值得欢迎不过的。但是问题首先在于是怎样的批评，而我们所说的怎样，不足指不论在什么时机都无事生非一番的“风格”，可惜这种风格在党内已成时髦了，而是指重要得多的东西——指批评的一般基础，指在批评中表现出来的一定世界观。

伊则格林即希伯尔发动的反对民军要求和拥护军国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实际上是一整套前后一贯的社会的、政治的世界观作基础的。

希伯尔在他维护军国主义的时候，是从这样的一般立场出发的，就是确信这种军事制度是必要的。他用一切可能的论据——军事技术上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论据——证明常备军必不可少。当然，从一定的立场来看，他是对的。常备军，军国主

① 本文发表在1899年2月的“莱比锡人民报”上，是对麦克斯·希伯尔的论文的答复。希伯尔先在1898年11月的“社会主义者”月刊上用伊则格林的署名发表了：“恩格斯是信仰民军的吗？”。在考茨基驳斥了这篇文章之后，为了答复考茨基，希伯尔又用本人署名，在1898—99年度第19—20期的“新时代”上发表了：“恩格斯和民军制度”。

义，事实上是决不可少的，——但是，对谁？是对今天的統治阶级和現在的政府。因此，除了得出下述的結論以外，还能有别的結論么？——对于現在的政府和統治阶级，从他們的阶级立場出发，废除常备軍和采用民軍制度即人民武装，看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合理的事。如果說，希伯尔在他这方面同样認為民軍是不可能和不合理，那么这只是表示他自己在軍国主义这个問題上是站在資产阶级的立場，表示他是用資产阶级政府的或資产阶级的眼睛来看民軍。他的每一个論据也證明了这一点。他認為，用武器把一切市民装备起来——这是民軍制度的基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們沒有錢办这件事，“文化任务已經苦得够了”。可見在这上面他是简单地从今天的普魯士和德意志的財政出发的，他在民軍制度問題上也根本不能有別的想法，——例如对資产阶级用累进的形式課稅等。

希伯尔認為青年的軍事訓練——民軍制度的另一个基石——是不合我們願望的，因为在在他看来，作軍事教官的下級軍官会把墮落的习气影响青年。这里，他当然是从今天的普魯士軍營中的下級軍官出发的，是把他們简单地带到想象中的民軍制度中去当青年的教官。他的这种理解方法讓人生动地想起尤利烏斯·沃尔夫教授，这位教授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認為，照他估計，在社会主义統治下——利息率会普遍提高。

希伯尔認為今天的軍国主义在經濟方面看来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減輕”社会所承受的經濟压力。考茨基煞費苦心地猜測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希伯尔怎么会想出用軍国主义来“減輕”負担的，并对于每一个可能的解释都作了中肯的答复。可是，希伯尔显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从劳动人民的立場来看

問題的。当他談到“減輕”負擔时，就很明白，他是想着資本。而他無論如何在这点上是对的：对資本來說，軍國主义是最重要的投資形式，从資本的立場看來，軍國主义确乎是一种減輕負擔的办法。希伯尔在这里是以資本利益的正确的代表人身份講話，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証明，就是他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找了一个著名的見証人。

“各位先生，我認為”——这是 1899 年 1 月 12 日在国会會議上的一段发言——“有人說 20 亿国債完全作了非生产的支出，一點也沒有向你們提供生产性的收入，这也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再沒有比軍事支出更加带有生产性的投資了”。这里，速記錄还告訴我們“左翼活跃”——这兒演說者是——弗拉海爾·封·施土謨^①。

希伯尔的一切主张，特点不在于它們本身就是錯誤的主张，倒是在于它們是把資產階級社会的觀點作基础的，因为如此，从社会民主党的觀點看來，一切事情在希伯尔手上都是顛倒看的：常备軍不可缺少，軍國主义在經濟上有治病的功效，民軍不切实际，諸如此类。

希伯尔在軍國主义問題的一切要点上的觀點，同他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問題——即关税政策上的觀點何等一致，这是很令人注目的。

首先，在这个問題上，也同在那个問題上一样，我們看到，他是坚决拒絕把这种或那种立場同民主还是反动的問題联系起来的。希伯尔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发言稿中說，以为自由貿易就是进步而保护关税就是反动的主张，是錯誤的。仔細回想

① 施土謨，大工业資本家，施土謨康采恩的創办人；德意志帝国党領袖，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死敌。——譯者

一下历史就可以證明，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自由貿易家，同时是一个反动派，反过來說，一个主张保护关税的人，可以同时是民主的好朋友。我們現在听到几乎同样的話：“有热烈拥护民軍制度的人，他們給工商业生活带来无穷的扰乱和間斷，他們要把下級軍官的精神装到青年头脑中去直到学校中最后一个班次，——比今天的軍国主义恶毒得多。有反对民軍制度的人，他們对于軍事干涉和軍事要求的这样的到处蔓延的現象是誓不两立的。”^①

資產階級政治家們在这个問題上，也同在别的問題上一样，是没有原則立場的，他們奉行的是随机应变政策，由于这个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希伯尔也就認為有权利和有必要否認保护关税和軍国主义的反动內核，或者否認自由貿易和民軍制度的进步意义，就是說，在这两个問題上，同样采取无原則立場。

第二，我們在这个問題上，也同在那个問題上一样，看到他一面反对保护关税或者軍国主义的个别弊害，一面坚决拒絕同两个現象的本身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斗争。在斯图加特，我們在希伯尔的报告里，听到同个别过高的关税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可是同时也听到这样的警告：別把自己“拖住了”，不要“束缚了自己的手”，这就是說，不要繼續不断地到处同保护关税斗争。現在我們听到，希伯尔还是容許“对軍国主义的具体要求进行議会斗争和宣传斗争的”^②，不过他警告說，不要把“純粹表面的偶然的东西，和(軍国主义)对其他社会生活領域的十分次要的、当然也是十分偶然的反作用，当作是它的本質和核心”^③。

① “新时代”第19期，第580—581頁。

② “社会主义者月刊”11月号第495頁。

③ “新时代”第19期第581頁。

最后，第三，这是上述两个观点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那个问题上一样，现象的最后估价，完全是从以往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出发的，就是说，从带有历史条件的进步一面出发的，完全抹煞了它后来的、现今的发展，因此抹煞了被研究的现象的反动一面。在希伯尔眼中，保护关税还是已故的李斯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看到的那样：是一个大进步，超越了德国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分裂状态。至于到了今天，普遍的自由贸易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已经成为超越内部壁垒的必要一步，因而各国的关税壁垒已经成为一种反动，这种情况，在希伯尔看来是不存在的。

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也是一样。他对军国主义仍然是从一个大进步的观点来看的，在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常备军，同从前的雇佣军队和封建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进步。在希伯尔看来，发展到这里，就停止不前了。在他看来，历史是不会超越常备军制度把义务兵役制进一步实现的。

希伯尔不论在关税问题上或者在军事问题上，都采取了这些独特的观点，它们的意义何在呢？第一，它们表示用随机应变的政策代替原则立场，第二，表示在反对原则立场的同时反对体系本身。那么，这种政策，除了是我党最近时期历史上熟知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外，还能是什么别的政策呢？

实行民军制度的要求，是我们整个政治纲领的基本论点之一。伊则格林—希伯尔公然拒绝这个要求，这是“现实政策”在庆祝胜利，从党的政治立场看来，希伯尔的行动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只有联系着整个机会主义思潮，并从机会主义一般基础和后果的观点出发，才能对于最近这个发生于社会民主党内部而有利于军国主义的声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估价。

二

机会主义政策的本質标志，就是它一貫地不断发展到把运动的最終目的、把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眼前的、并且想象出来的利益而牺牲掉。希伯尔在軍事問題上的主要命題之一，鮮明地証实了这条定理对于希伯尔的政策也是确切适用的。按照希伯尔的看法，使我們不得不坚持軍国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經濟理由是，这个制度在經濟上“減輕”社会的負担。我們姑且不說这个少見的主张連最简单的經濟事实都假装不知到了。相反，为了指出这种理解方法的特征，我們暫时假定这个荒謬的主张是真理，軍国主义事实上使“社会”“減輕”了多余生产力的負担。

这个現象在工人阶级看来是怎样的呢？显然是，軍国主义把劳动后备軍的一个部分，把这种使工資降低的人的一个部分，通过常备軍的維持而解脱出来，因而改善了劳动条件。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工人阶级为了减少劳动市場上的供給，为了限制競爭，首先要把他的一部分工資用間接稅的形式交出去，以便把他的競爭者当作兵士养活着；第二，他把这个競爭者当作一种工具，資产阶级国家用这种工具把它的以改善自己生活为目的的每一个活动（罢工、集会結社等等）都鎮压下去，必要时把它淹死在血泊中，因此，工人生活的那些改善——照希伯尔的意思，軍国主义之所以必需就是为了这种改善——也会烟消云散；第三，工人把他的競爭者作成了國內政治上一般反动的基石，因而也是他們自己在社会上被奴役的基石。

換句話說：由于軍国主义，工人在一定數額上防止了工資的

直接減少，但是为了这一点，却大大丧失进行持續不断的斗争来提高工資和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沾了便宜，但是作为一个市民，他在政治运动的自由上受了損失，归根結底，作为劳动力的卖者他也受了損失。他排除了一个劳动市場上的競爭者，結果是产生了一个工資奴隶制度的保护者，他防止了一次降低工資，結果是既縮小了不断改善自己生活的前途，又縮小了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会上最后解放的前途。所謂由于軍國主义工人阶级在經濟上“減輕”負担，其实际意义就是如此。我們在这里，同在所有的机会主义政策空想家那里一样，看到把社会主义的阶级解放的伟大目的为眼前小小的实际利益牺牲了，并且这些利益經過仔細觀察證明还是想象出来的。

倒要問，希伯尔怎么会有这样不合理的思想，也从工人阶级立場把軍國主义当作“減輕”負担来宣布呢？我們回想一下，从資本的立場看来这个問題是怎样表現的。我們已經說过，軍國主义为資本創造了最賺錢和最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式，通过稅收納入国家手中用来維持軍國主义的那筆資金，假如仍然留在居民手中的話，就是一笔不断增长的对生活資料的需求，假如由国家大量地用在文化用途上，同样是一笔对社会劳动的需求，这是很明白的。这样，对于整个社会來說，軍國主义决不是什么“減輕”負担，这也是很明白的。可是，从資本主义利潤的觀点看来，从企业主的觀点看来，問題就不同了。在資本家看来，对于产品的一笔需求，是在分散的私人买主手上还是在国家手上，那是完全不同的。国家的需求的特点是可靠，量大，价格高，大都是壟斷价格，这些特点，使国家成为資本的最好的顧客，而向国家供应产品成为資本的最光輝的业务。

使軍事供应比較如国家文化支出（学校、道路等）特別有利

的，是不断发生的技术变革和支出的不断增长，因而，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利潤的不竭的源泉，并且是越来越丰富的源泉，它把資本提高到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好比資本在克虏伯和施土謨的企业里在工人面前是社会权力一样。軍国主义，对于整个社会來說，是經濟上完全不合理的、生产力的大量浪費，对于工人阶级來說，是压低他們的經濟生活水平，其目的是使他們在社会上被奴役，对于資产阶级，軍国主义在經濟上都是最光輝的、无可代替的投资方式，正如它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他們的阶级統治的支柱一样。因此，当希伯尔毫不思索地把这个軍国主义宣布为經濟上“減輕”負担的必要手段的时候，显然，他不仅把社會利益的观点同資本利益的观点混为一談，从而——我們在开头已經說过——站在資产阶级立場，并且，当他認為企业主的每一个經濟利益必然也是工人阶级的經濟利益的时候，他是从資本与劳动利害協調的原理出发的。

这又是我們在关税問題上曾經从希伯尔那里領教过的一个观点。在关税問題上，希伯尔由于把工人当作生产者，想保护他們使他們不受外国工业的危险競爭的影响，他在原則上拥护保护关税。在关税問題上，同軍事問題上完全一样，他只看到工人的濟經利益，忽略了他們的更远大的社会利益，而这种利益是同实行自由貿易或廢除常备軍这些一般的社会进步联系着的。在这个問題上，也同那个問題上一样，他所認為是工人的直接經濟利益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成为資本的利益的东西，因为他相信凡是对企业主是利益的东西，对工人也是利益。为实际的眼前的收获牺牲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从資本和劳动利害協調的观点估計实际利益，——这两个基本原理，既是和諧地相互結合着，又成为一切机会主义政策的本質标志。

一个拥护这种政策的人，居然会引述社会主义綱領的創始人的话，認真地——因为他在軍事問題上的保护人是施士謨——把恩格斯看成是自己在軍事問題上的保护人，这种情形，最初一看是会令人吃惊的。希伯尔妄想同恩格斯有共同之点的东西，是关于軍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見解。可是，这不过再一次証明，如果说过去是消化得不好的黑格尔辯証論曾經在头脑中引起不可救藥的混乱，現在是消化得不好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觀。并且，这是又一次表明，无论是一般地说，辯証的思想方法，或者，特殊地说，唯物的历史哲学，两者在正确掌握了的时候是多么革命，只要錯誤地理解了，就得出危险的反动的結論。如果我們讀了希伯尔所引的恩格斯的話，即“反杜林論”中关于軍事制度向它自己的消灭和向民軍发展的一段，那么，最初一看，希伯尔在这个問題上的見解同党所慣常抱有的見解究竟不同在那里，是不清楚的。我們，同他很相象，把軍国主义看成历史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希伯尔也是这样。我們認為軍国主义进一步发展到民軍，——希伯尔也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分歧把希伯尔带上他的反动的反对民軍要求的立場上去的呢？非常简单：如果我們同恩格斯一样把軍国主义向民軍发展的内在发展傾向看作不过是消灭軍国主义的条件，希伯尔却認為未来的民軍也是从今天的軍国主义中自發地“从内部”成长“出来”的。如果我們想利用条件——义务兵役制的推广和服役期間的縮短——通过政治斗争实现民軍制度，希伯尔却听憑軍国主义和作为它的后果的种种現象自己发展，把每一种促进民軍制度实现的办法都烙上幻想和空談政治(Bierbankpolitik)的印記。

这样，我們得到的，不是恩格斯的历史觀，而是伯恩斯坦的历

史觀。正如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自發地、沒有飞跃地、逐步地“長入”社會主義，希伯爾則認為從今天的軍國主義中自發地長出民軍來。正如伯恩斯坦關於整個資本主義有這種看法，希伯爾則關於軍國主義有這種看法，他們都不是認為，客觀發展只是把一個更高級的發展階段的條件交到我們手上，如果沒有我們抱着自覺的目的參加進去，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變革或為實現民軍制度的鬥爭，無論社會主義或者民軍制度都不能實現。因此，那種舒舒服服“長入”的想法是一個空想，一個機會主義的借口，是為了迴避目的明確的革命鬥爭，因而，在這種道路上可以達到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也成了可憐的資產階級點綴品了。正如，在伯恩斯坦的“逐步社會化”的理論中，到最後，我們所理解的屬於社會主義概念本身的一切完全消失了，社會主義變成了“社會統制”，變成老老實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了；那麼，在希伯爾的見解中，“民軍”的概念也變了，從自由的、依據客觀發展所提供的給我們的物質條件自己決定戰爭和和平的武裝人民，——這是我們的目的，——變成按照今天短期服役的常備軍制度將一般兵役義務普遍推廣到所有一切有資格的市民。希伯爾的見解，用到我們政治鬥爭的一切目的上，就是整個社會民主黨綱領筆直地走向死亡。

希伯爾的走到擁護軍國主義，是對於我黨黨內全部修正主義思潮的具體說明，同時也是修正主義思潮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步驟。我們早些時候也聽到一位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海尼說過：我們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同意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要求。但是，在那時候，這種作法僅僅是當作為社會民主黨的最高目的而作出的讓步來考慮的。照海尼的意見，大炮至少只當作交換人民權利的交換對象來用。現在，希伯爾却宣布為大炮而大炮

是必需的。虽然这里的結果同那里一样——都是支持軍国主义，但是，在海尼那里，至少还是以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的錯誤理解为依据，而在希伯尔这里，干脆是从改变斗争目的出发。那里，只是建議用資产阶级策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里，却无耻地用資产阶级綱領代替社会民主主义的綱領。

在希伯尔的“民軍質疑”中，“現實政策”已經得出它的最后的結論，它在反动的方向上已經无法再进一步了，还没有作到的，只是——把現實政策推广到綱領的其他論点上，脫掉社会民主主义大衣的残余，脫掉披在身上的破布，赤裸裸地，象——法勒尔·諾曼那样出現。

三

“萊比錫人民报”在1899年2月24日收到希伯尔寄来的下述来信，作者要求公开发表：

亲爱的朋友熊朗克！

我总是抱着很大的兴趣来讀“萊比錫人民报”的社論，倒不是因为我对它們的一切論点都贊成，而是因为我对于它們的活跃的战斗性，誠实的自信心和富于启发的辯証法，估价很高。

的确，这一次我看到从一个前提的基础出发，得出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結論，不是不感到惊奇的。

“按照希伯尔的看法，使我們不得不坚持軍国主义制度的經濟理由是，这个制度在經濟上減輕社会的負担……希伯尔也从工人阶级立場把軍国主义当作‘減輕’負担来宣布……因为他是从資本与劳动利害協調的原理出发的。”

結論是可敬的，只是前提却絕對地誤會了，不充分。我在“新时代”上只是說，巨大的非生产支出——不論是个人用于荒唐的奢侈和羞怯的蠢事上的也好，是国家用于軍事、俸祿和形形色色的胡鬧上的也好，——減輕危机发热病。一个“生产过剩”的社会，当非生产的浪费不是在用于生产目的的积累之旁不断扩大地盘，就会經常因这种热病发生震动。这种說法，显然是一点也沒有批准浪费和非生产支出的意思，更沒有把它从工人階級利益来提出。我不过想提到它們“对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作用，通常称为实际的作用。

我自始就把自己估价为一个“为这个现代社会”斗争的人，同时，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爭辯我还有种种經驗，为了避免任何誤会起見，我在談到生产过剩的一节还补充地插过这么短短一句：

“当然，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使軍国主义更加中意，倒是更加不中意了。”意思就是說，更加討厭了。但是，就連这种在我这方面已經多余的保証，看来也是无济于事：事情仍然是——正如跟一个資产阶级妇女爭論一样。

虽然如此，我在指出了“萊比錫人民报”社同人的誠实以后，相信他会看到这里曾經采取的出发点是完全錯了，因此，我們之間的无产阶级革命奖章竞走必須从头再来一次。

你的 麦克斯·希伯尔

四

如果希伯尔同志抱着惊奇的感觉來讀那根据一个他所公开发表的觀点得出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快的結論”，那么，这不过

又一次證明了，就在人們沒有邏輯的地方，觀點也有它的邏輯。

上面的希伯爾的答復，首先，對於他在“新時代”上正式表述了的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軍國主義在經濟上“減輕負擔”的思想，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補充；現在，除了軍國主義以外，作為減輕經濟負擔和預防危機的手段的，還有“俸祿和形形色色的胡鬧”和“個人荒唐的奢侈和羞怯的蠢事”。這樣一來，關於軍國主義的經濟作用的特殊觀點，就展開成為以浪費為資本主義經濟校正者的一般理論，並且，證明了我們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作為政治經濟學家的弗拉海爾·封·施土謨說成是希伯爾的保護人，是不公道的。施土謨把軍事支出稱作最有生產性的支出的時候，至少考慮了軍國主義在爭奪銷售市場和保卫“祖國工業”方面的意義。可是，象已經証實的那樣，希伯爾談軍國主義的時候，對於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有的作用是完全不看的，他認為軍國主義只是年年把一定量社會勞動耗費完的一種巧妙形式；在他看來，軍國主義在經濟上就同巴黎的德·俞裁公爵夫人的 16 条小狗一樣，它們佔了整座房子，用了幾個僕役和一整間狗更衣室，為資本主義經濟“減輕負擔”。

很可惜，希伯爾同志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千變萬化中，每次都同昨天的傾向決裂的那麼徹底，以致過去的思想在他連一點兒影子也沒有留下。不然的話，他曾經當過洛貝爾圖的門徒，應該記起在《第四社會書簡》的古典冊頁中論及封·凱爾希曼的地方（第 34 頁起），那里他以前的老師曾經駁斥過他今天的以奢侈医治危機的理論。但是，這種理論比洛貝爾圖還要早得多。

如果說，特別是通過軍國主義來減輕經濟負擔的思想能夠——至少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中——發生新鮮的魅力，那麼，

認為浪費具有挽救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的一般理論，就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同樣古老。

庸俗經濟學在它發展的曲折迷途中，的確提出了許多種危機理論，但是，我們的希伯爾在今天所據為己有的那種理論，是屬於最陳腐的一種，就它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機構的認識來說，它甚至還低於庸俗經濟學的不幸的丑角薩伊，——照薩伊的看法生產過剩原來就是生產不足。

什麼是希伯爾理論的一般前提呢？危機之產生，是由於同生產了的貨物總量對比起來，消費顯得太少，因此，危機可以用擴大社會內部消費的辦法來防止。照這種說法，資本主義危機的形成，不是由於生產有超越銷售市場範圍的內在傾向，不是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是由於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絕對的比例失調。照這種看法，資本主義社會的貨物總量，可以說是一座有一定大小的米山，社會應該把它吃光。消費得越多，作為未消化的剩餘壓在社會的經濟責任心上的負擔越少，“減輕負擔”越多。這是一個絕對的危機理論，它同馬克思的相對的危機理論的關係，恰恰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同馬克思的相對人口過剩規律的關係一樣。

但是，照這個機智的理論看來，對社會來說，究竟誰是消費者，是並不一樣的：如果消費適足以使生產同時又活動起來，那麼米山又增高了，“社會”一無所得，危機發熱病同從前一樣震動著社會。只有在貨物被吸收而永不再見的時候，在它用於人們消費的時候，而人們又不再生產的時候，那時社會才真正吐一口輕鬆之氣，危機的形成是被防止了。

企業主老拿他生產的（就是說他的工人們生產的）商品不知怎麼办好。幸而企業家老孔過得荒唐奢侈，向他的窘迫萬分的

階級同志买了討厭的商品。而老孔自己也生产有多余的貨物，成为他的“負擔”；幸而上面提到的那个老亨同样喜欢“奢侈和蠢事”，他倒过来向那忧心忡忡的老孔作一个被热望着的顧客。現在，在业务平安結束以后，我們的两位企业家相对愕然，他們有兴致地叫道：是你疯了呢还是我呢？其实他們两个都是。因为，照希伯尔的劝告做了之后，他們得了什么結果呢？当然，他們双方誠心誠意地彼此帮助，把一定量貨物破坏无余。但是，喲！企业界的目的不是破坏物質財富而是把剩余价值實現成灿烂的黃金呀。而在現在这种关系中，这个滑稽的业务等于是两个企业家各自吃完、消費完自己的多余的剩余价值呀。这就是希伯尔減輕危机的手段。威斯脫法仑的煤矿大王們苦于煤的生产过剩么？蠢家伙！他們只要在他們的高楼大厦里燒得热些，煤市場就“減輕負擔”了。卡卡拉的大理石矿主为商业停滞叫苦么？他們可以用大理石盖馬廄，大理石业的“危机发热病”立刻就防止了。如果有一片普遍商业危机的威胁的烏云升起来，希伯尔就向資本主义叫道：“多吃些牡蠣，多喝些香檳酒，多用些穿号服的侍者，多要些舞女，你就得救了！”我們怕的只是那些老奸巨滑的家伙会回答他說：“先生呀，你把我們看得太笨啦！”

可是，从这个机智的經濟理論还可以得出有趣的社會結論和政治結論。就是說，如果单单非生产的消費、即国家的消費和資產階級的消費，就是減輕經濟負擔和緩和危机的对症良药，那么，尽量扩大不生产的消費，尽量限制生产的消費，尽量扩大社會財富中归資本家和国家的部分，尽量縮小留給劳动人民的部分，利潤和稅收尽量的高，工資尽量的低，——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和有利于生产循环的平稳进行。工人是对社会的一种經濟“負担”，而愈裁公爵夫人的小狗是經濟的救命錨，这就是希伯

尔的“減輕負擔”論的結論。

我們說過，這個理論，就在庸俗經濟學的各種理論中也是最陳腐的一個。衡量庸俗經濟學的陳腐程度的標尺是什麼呢？庸俗經濟學的本質，在於它觀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不從它的深處的聯繫和它的內在本質，而從競爭規律搞得四分五裂的表面現象，不從科學的望遠鏡，而從資產階級社會當事人的眼鏡。但是，社會的圖景是隨著這些當事人的立腳點而變的，這個圖景能多少歪歪斜斜地映在經濟學家的腦袋里。立腳點越接近真正的生產過程，觀點越接近真實。研究者越是離開生產過程走向交易市場，走向被競爭充分控制的領域，那麼，在靠近生產的地方所看到的社會的圖景越是顛倒過來。

我們曾經指出，希伯爾的危機理論，從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是絕對站不住的：它總起來說是一個勸告，說資產階級應該自己消費掉他們生產的剩餘。但是，就是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工業家也會對它聳聳肩膀。一個克虜伯或者一個海依爾要聰明得多，不會那麼愚蠢，以為自己的和自己階級的同志們的奢侈浪費，竟能在某種形式上解決了危機。只有一個資本主義商人，或者正確些說，一個資本主義小販，才會有這種觀點，因為在他看來，他的直接主顧“大先生們”和他們的奢侈浪費，就是整個經濟的基礎。希伯爾的理論，完全不是資產階級企業家的觀點的翻版，倒直接是資本主義小販的觀點的理論表現。

希伯爾的通過軍國主義“減輕”社會負擔的思想，同當年伯恩斯坦的解釋一樣，又一次地證明，在政治上，修正主義走上的資產階級的立場，在經濟前提上，它所依附的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

但是，希伯爾所駁斥的，是我們從他的“減輕負擔”理論得出

的政治結論。他只說過減輕社會的負擔，沒有說過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並且，他为了避免誤會起見，明明还插上了一句保證，就是，在他看来“这不是使軍國主义更中意，倒是更不中意了”。人們可以相信了吧，希伯尔从工人階級的立場認為軍國主义在經濟上是起敗坏作用的呢。

那么，他提到減輕經濟負擔的目的何在呢？在工人階級對待軍國主义的态度問題上从这里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們听着：“当然，在我看来，这（減輕經濟負擔）不是使軍國主义更合意，倒是更不合意了。但是，我从这个立場出发，也不能同意小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那种叫囂，以为非生产的軍事支出会引起經濟破壞。……”^①由此可見，希伯尔把那种認為軍國主义在經濟上有破壞作用的主張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主張，認為是錯誤的。那么，在他看来，軍國主义不是破壞，在他看来，“同意”那反对軍國主义的“小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叫囂”，即反对軍國主义的斗争，是荒唐；是啊，他的整篇文章，目的正在于向工人階級證明軍國主义不可缺少呀。在这面前，他插进去的保證，所謂在他看来軍國主义不是更合意、倒是更不合意，还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完全是一个心理上的保證，說希伯尔不是心满意足地保卫軍國主义，而是带着厌恶的心情的，說他对于他的机会主义政策本身并不感到愉快，說他的良心比他的头脑好些。

鉴于这个事实，我就不能接受希伯尔的邀請同他一起作“无产階級革命思想”的竞走。忠厚之道不允許我同这样的人竞走，因为他背朝着出发点走进跑道的时候，他是处于可以想象的不利地位中的最不利的地位。

① “新时代”第20期第617頁。

站在工人背后的“德意志科学”^①

一位新的先知在德国工人阶级面前站起来了。威尔纳·宋巴特副教授在勃累斯芬对德国无产阶级布讲希望和信仰的福音。他教导你们说：“我的工人先生们”——活象一个拉萨尔——从一个新的“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的“鸟瞰”出发研究劳动问题的领域，他向你们保证，“德意志科学”站在你们的背后，他嘱咐你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努力下去，斗争下去，一起来代表社会进步的事业，在文化的轨道上前进，为了我们可爱的德意志祖国的幸福，为了人类的骄傲！”

“一起”，“下去”，听起来实在有些蹩扭，因为到现在为止，德国工人阶级还很少享受同宋巴特先生一起努力和斗争的愉快呢。当然，他们是斗争过来的，在宋巴特先生还舒舒服服躺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们已经为德意志祖国的幸福、为人类的骄傲而斗争了，他们通过努力和斗争代表着社会进步的事业，很快就有半个世纪了，而宋巴特先生的努力和斗争却是新近发生的事。

不过，这总之是一点小小的不确切处，在滔滔不绝的发言中

① 转录自 1899—1900 年度“新时代”第 51—52 期。写作本文的动机是宋巴特教授的一本著作引起的，这本著作叫做“虽然如此！——论职工联合会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历史”，耶拿，1900 年。这位教授当时在勃累斯芬工作，也想在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范围内，用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讲演，发挥他一段时间的影响。

会带出来的。我們且不去考究这位新先知的修辞之花吧，我們且誠心地傾聽，那个正确的、現實主义的、历史的方法，那个站在我們后面的“德意志科学”，关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究竟要說些什么吧。

“首先，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取份額的提高，并不受任何自然規律的框子——其扩大出乎工人本身力所能及的一切范围的框子——所限制”（《虽然如此！》第 70 頁）。誠然，科学早先曾經提出过所謂工資基金理論和工資鐵則，想在工資的变动中发现出不变的經濟規律。宋巴特先生駁斥了这两种理論，毫不費力，因为这些理論早在几十年前就給馬克思埋葬掉了，所以要駁斥它們就更加毫不費力了。尤其是，宋巴特对拉薩尔的“习惯的”工人生活水平作了一个新的解释，用这个解释，在他的推理中，就把里嘉图和拉薩尔的工資規律翻了个身。“用上‘习惯’这个字眼，可怕的規律就变成了无害的同义复述了”（同書第 71 頁）。因为，照宋巴特先生的意見，只要把“习惯”的意义規定为平均的工資高度，那么，只要把工人的最高可能的要求（如坐胶輪車）作成“习惯”，工資就象一支箭一样迅速地上升了，妙訣就在于此。宋巴特先生重复地說，“在‘作成’这个字眼上，應該看出一个同机械的工資形成觀念相反的觀察方法，看出一个……正确的、社會的觀察方法，这就是把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成不同的競爭集團間斗争的結果，这个斗争的結果，不是决定于那些可以从外表看到的、可以用数字表現的商品市場和劳动市場的情况，倒是同样程度上决定于那些决定着党派实力地位的别的因素。”（同書第

71頁)①

我們過几頁就会知道，这个分配斗争原来是很和平的。因为“德意志科学”已經解决了这样一个問題：对誰都給一些，向誰都不是取一些，讓工人變得富些，又不使資本家窮些。

就是說，一方面，象我們刚才看到的那样，工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减少广义的剩余价值来增加他們在国民收入中分取的份額。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工資提高了，企业主的利潤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減少。”（同書第 80 頁）宋巴特先生劝告“天才的企业主和高貴的商人們”，如果工資提高了，可以扩充生产或者改进經營技术，或者，最简单的是：提高商品的价格，这就把对于工人的讓步推卸到消費者身上了。但是，在“德意志科学”上，消費者大众也不是空手而去的：第一，宋巴特先生对消費者大众作了安慰，工資斗争不一定总是成功的（“当有人手可以及时补充的时候”！第 84 頁），第二，假定由于工資斗争商品变貴了，那么，由于購買高价商品而得到的“滿足”，就“最妙地——因为是最少損害地”——使社会对抗得到协调。在这上面这位教授先生依賴“妇人之心”最多，特別是倚賴未婚妻們。为了讓可怜的縫紉女工提高一些工資，“幸福的新娘为購買原来值 10000 馬克的嫁妝付了 10500 馬克就該成为困难了吗？”（第 82 頁）那是一定的，一个年輕待嫁的少女一定是政治經濟学上这个唯一“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所最好接近的，于是，工会运动的最后的困难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太阳也还有它的黑斑，最美丽的容貌也常常还有雀斑或者其他不够完美之处，所以資本主义社会也有它的“不够完美

① 著重点大部是本文作者所标的。

之处”，——这就是危机。可是，宋巴特先生也准备了一种解决危机的手段：又是工会运动。“如果，我們看到，对于資本主义的完成发展經濟生产力的伟大历史使命，工会沒有造成任何障碍，只有促进了它的完成，那么，就另一方面說，工会还适于解决这同一个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不够完美之处。”……“在这方面，我首先想到的是防止交換經濟机构中的扰乱，即防止危机”（同書第86—87頁）。

“天才的企业主”，把他对工人的讓步轉嫁給大众身上之后，发现作为这种德行的酬劳的，是銷路更大更可靠了。

因而，事事如意，皆大欢喜：工会會員得了較高的工資，企业主維持了原有的利潤，占有了更大的銷路。新娘得到了良心的平安和新郎，而教授宋巴特先生則天下聞名。里嘉图、拉薩尔和馬克思的全部科学废物抛进大海，“現實主义”方法的輕舟“一帆风順地航进了二十世紀……Vogue la galère（往前划吧！）”

但願不要象古时西班牙曼察地方的另外一位蛮勇騎士的大船一样，誤投到磨坊底下去呵。

* * * *

政治經濟学的古典学派，把工資运动归到自然規律的現象，归到人口規律和生产資本的絕對量，他們在这上面是走錯了，他們只是一貫地遵循着他們的基本方法，就是把資本主义社会的界限同社会的自然界限等同起来的方法，因而走錯了。对古典派政治經濟学作历史的辯証的批判，这个任务是馬克思完成了的，这个批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大多数場合一样，就是要把这些自然規律，倒过来翻譯成資本主义社会的規律。

整个資本主义經濟的目的是生产利潤，因而購買劳动力的目的首先也是利潤。于是，作为生产目的的一定利潤率对于招

收工人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同时，平均地說來，这个利潤率也就成为提高工資的最高界限。但是利潤有牺牲工資而无限扩张的、也就是把工資压到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內在傾向。工資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間，随供求情况、随可供运用的劳动力对有生产兴趣的資本量的比例，上下运动。

但是，在最发达的資本主义社会中，供給表現在产业后备軍，即表現为由同一資本“解放”出来的經常儲备着的劳动力，而需求不过是一定利潤率下由商品市場的一定情況所“慾求”到生产中去的那一部分資本。

我們看到，不論是平均的工資提高的极限，无论是工資提高的較高或較低的程度，都决定于种种因素，这种种因素归結起来还是追求利潤的兴趣，或者，如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价值增殖的需要”。

工会能够超越这个工資規律的界限么？这些界限当然不是“自然規律”的界限，这一点，宋巴特先生是跟馬克思学对了的。但是，这些界限，在資本主义經濟內部发生作用的时候，是同自然規律一样具有完全決定的性質的，因为它們就是資本主义的本質，是它的規律。

比方說，如果工会能够冲破作为工資提高的界限的企业主利潤，那么，这就是說，它能够廢除生产在今天的目的，从而廢除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石。

如果工会能够把产业后备軍从世界上消灭，或者限制它的不断增长，那么，工会就完成了防止无产化过程的工作，就是說，既消灭了資本主义生产的后果，又消灭了它的前提。

这一切是指工人的實際工資的运动來說的。至于宋巴特認為“任何时候”都可以无限提高的，工人在社会收入中取得的份

額，那么，尽管在实际工資可能在同时增加了的情况下，这个份額却直接由于資本主义发展而不断降低的。如果工会要制止相对工資的这种趋势往下降，那么，工会就得把資本主义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这一条生活原則麻痺起来，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当事人背后减少着工人生活資料中所包含的劳动，因而减少着工人从总产品中所取的份額。

工会自然可以通过組織劳动力的供給，来限制产业后奋軍，并从而限制資本的、否则是无限制的压力，把它限制到資本的利潤兴趣所还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工会發揮作用的唯一办法也正在于此。但是，如果宋巴特先生認為工会在工資提高方面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并且能够无限地增加工人在国民收入中取得的份額，那么，归根結底，他是不多不少地在說服工人，要工人相信走工会的路就可以废除資本主义經濟制度。

当然，在宋巴特先生看来，工資的决定也同国民財富的整个分配一样，是一个实力問題。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在社会的表面上，这是不可否認的。在社会的表面上，經濟規律是在人們的行为中，在工人和資本家的个人冲突中，在劳动契約中表現出来的。但是，宋巴特先生沒有看到作为这些实力表現的基础、并制約着这些实力表現的客觀規律。他看到的情况，正如个别当事人、个别工人或企业主意識到的情况一样，因而那个崭新的、“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露出了真相，原来就是古老的、有名的——庸俗經濟学。

庸俗經濟学处理問題的方法，大家知道，同辯証的批判是不同的；它十分自滿地把古典派經濟学所树立起来的“自然規律”，当作破衬衫一下抛掉，而这样作的时候，把对于資本主义經濟的任何合乎規律的說明也根本否定了，宣告了“自由意志”的、“自

觉干涉社会过程”的、社会集团的“实力”的王国。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即在这个社会里面起着作用和推进发展的种种矛盾，一点也不会因为这个科学的“裁决”就消失不見。但是，現在，这些矛盾本身就将作为偶然性、作为小小的估計錯誤、作为小小的“不够完美之处”表現出来，它們似乎可以用一点真誠的意志和智慧，用这里一句好話，那里一点同情就“解决”了的。宋巴特教授在向工人們宣布了工資可以无限提高的美丽远景之后，为了把他的教授气派的話發現，从而从资本主义矛盾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中爬出来，他有滿手的事情要作。我們已經看到，他把工資的提高轉嫁到利潤上，把利潤的損失又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这里他沒有能力再轉了，只有訴諸消费者的良心，为了易于取得效果，他事先就把消費者想象成为一个待嫁的年青姑娘。这样，最后就有一个义务落到他头上了，为了保証工会的效果合于他的处方，他就得为每一个有錢的姑娘找一个如意的新郎。

我們怕这也是白費心机吧。因为，宋巴特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既不彼此相关又不实际互相抵偿的事物定成其“关系建立”和“实际相抵”，——这是照这位教授的风格說的，——他的补訂：“这里不再細述的情势”，已經在每一个角落上都脫了胶了。

企业主該用提高他的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抵偿由于工会行动而实现的工資的提高。——如果教授先生以为商品价格可以这样简洁了当地提高的，那么他連价格形成的一切“本質性”都忘光了。如果价格的高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它的效果就会自己抵消。如果个别的企业主提高价格，那么他的同事先生們的竞争不久就会教訓他懂得規矩。如果也有个别的企业主集团执拗地要提高价格，那么这些集团只有在大众面前占据着实

力地位的时候，也就是組成聯合、卡特尔等等的时候，才能办到。不过，在这些集团中，資本的实力地位同工人对比起来是更要大得多的，这个实力地位，——真是不幸，——恰恰在宋巴特的“轉嫁理論”的唯一前提存在的地方，一般使工会的成果不可能发生。宋巴特先生在談到工会的实力地位的时候，根本忘記了企事业主联合組織的存在，只有在他把企业主联合組織当作一种滿意的手段用来补充那干涉劳动爭議的可爱的方法的地方，才記得起它。

或者說：企业主如果不能采用提高价格的办法，他就該扩大生产来抵偿工資的提高。——但是，不等宋巴特先生劝告，他們已經自动地这样作了，从現在已經想不起的时候起，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們就是这样作的。那些生产扩大的时期，即工业繁荣的时期，自然是要求提高工資的好机会。但是，扩大生产在这里不是什么可以随意运用的抵偿工資提高的手段，倒是相反，它是使工資提高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而扩大生产自己又依賴市場情況，这又是說依賴資本自我增殖的利益！

或者說：那么，企业主應該干脆用改良技术的方法抵偿工資的提高！——喲，教授先生，这件事，只有您的“幸福的新娘”相信您！技术改良，企业家們早就用了，是用来麻痹进行工資斗争的工人，倒不是用来滿足工人。你去听听 80 年代末汉堡煤坑工人工資斗争的历史吧，煤坑老板采用了一种叫作“榮普机”(Jump-machine)的机器，馬上解决了工人离职的問題。

当教授先生滿头大汗地为了討好工会把一切利害对立都化成利害協調的时候，对于危机，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这个“不够完美之处”，常常被用来当作反对工会的最凶恶的“手段”之一。宋巴特先生把事情倒了过来，他倒把

工会当作反对危机的手段来介绍。他说，“首先，生产之火多少克制了一些。因为，工人所提出的要求，总是首先意味着因提高生产费用而产生销路的困难，在有些情况下也直接是对于生产规模的一种限制……”（同书第87页）。但是，我们刚才还听说：工人的要求引起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改良，也就是说，引起生产旺盛，并且，它不是使“首先”发生的停滞状态得到解决，而是使已经回落的利润得到扩大，就是说，扩大到企业以前的规模之上！

但是，对付危机的持久的手段，彻底的手段，一个德国教授，如果他不想糟蹋德国政治经济学的神圣传统，他就千万不应该同科学的研究者一起到生产关系中去找，倒应该同小贩一起到分配关系中去找。……他说：“工会所努力争取的提高工人阶级在生产成果中取得的份额的事，久而久之会产生减轻危机的作用，因为它增加了群众的财富，扩大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因而巩固了在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广大群众队伍里的销路，从而巩固了经济生产的无扰乱的发展”（同上）。在个别企业主看来，——庸俗经济学总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正如教授先生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的“富裕”是解决他们货栈中滞销货的一个手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所有的企业主看来，在阶级看来，宋巴特先生的巧妙手段，不过是让他们掏自己的腰包去扩大消费者的购买力，以便使他们能够卖出更多的商品而已。如果直接向企业主解释清楚，告诉他们应该定期地把多余的商品储备送给工会会员，以便保证“经济生产的无扰乱的发展”，那不是更加简单么？我相信，我们的“高贵的商人”和“天才的企业主”，他们是那样精明，他们会简单地答复他说：教授先生呵，您忘记啦；庸俗经济学是制造出来欺骗工人的，不是欺骗资本家的呵！

此外，宋巴特的危机治疗法中最漂亮的一着是这样一个主张，認為人們总之可以用扩大銷路的办法“經久地”防止停滞現象！这同样是从“德意志科学”家具中取出的一件古老可敬的小摆設，——請参考杜林先生的著作。但是，——宋巴特先生悒悒不乐地說：“沒有一种那么經常那么錯誤地受到駁斥的理論不是时时重新复活并且能在一段時間里搞乱无成見者的头脑的”（第68頁）。如果一个头脑被它所刚刚駁斥过的理論搞乱，那就更糟糕了。扩大正常需求足以“減輕”危机的假設，前提是生产不会同样輕易地超过現在已經扩大了的市場界限，这就是說，生产的界限，或者說，生产資本——这是同一回事——有一个被限定了的范围。这么一来，这位教授就又巧妙地回到工資基金理論上来了，而这个理論，正是他方才說明工資可以无限增长的时候特別从坟墓中发掘出来，心滿意足地重新打死了的。

資本主义的客觀对立，就这样作为庸俗理論的主觀过失反映出来，社会矛盾，就作为它的邏輯謬誤反映出来；庸俗理論把同資本的对立中产生出来的現象之一——工会放在总的利害協調的基础上，想把它当作不依一切“自然規律的”界限为轉移的——即不依資本主义的界限为轉移的实力因素。但是，庸俗經濟学的实际却是，正是在它在实力意識和自由意志中自以为超越社会規律的地方，它实际上通常象皮球一样最大限度地被盲目的社会力量所玩弄。

我們已經看到，工会的作用受一定經濟界限所限制，这些界限总起来就是資本的增殖需要。可是，就在这界限以內，工会的行动也完全决定于資本的痙攣式的发展。

营业情况好，它爭得工資的提高，营业衰退，它通过防御斗争来保持这个工資；在可以使用的劳动力为資本雇佣較多的时

候，在技术停頓的时候，它取得組織上的成果；在危机或者中等阶层的无产化使新生后备劳动力涌到的时候，或者在技术革命的时候，这些成果又破坏了或者暂时动摇了；总之，它的运动总“仅仅是資本积累运动的反映。”（馬克思）

是呵，工会对于工人阶级的固有經濟职能，正在于跟着資本的运动去限制資本的作用，并同时为自己謀利益。

我們且回想一下，在工会运动开始以前的劳动条件是什么一种景象。不只是絕對的貧困，成为当时情况特点的，第一是工人阶级在不同時間的生活状况很不安定即很不均匀，第二是在每一个时候，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情况很不均匀。这时，資本在高涨时把劳动力一下抛上了天，在衰落时把它毫无限制地扔到地上。如果个别的一些熟練工种的工人过着如小資产者那样的生活，那么所有其他一切阶层被压到自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生活标准以下，注定着干脆是等死。

工会，当它关心着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的共同利益的时候，就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由于它在高涨时期爭得了利潤所容許的最高限度工資以便在衰落时期用它进行防御斗争，由于它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同时把处境最好的职业吸收到共同的組織中来，最后，由于它不仅为每种职业而且也为整个阶级創造了共同的章程（劳动時間等），它使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在生产的不同阶段上，局部地也在它的不同阶层之間，变得比較齐整，带来生活状况的一定的稳定性。因为如此，由于工会，工人的“习惯生活水平”，才作为历史实在、作为現實产生，而在工会斗争开始之前，它不过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各样生活水平的仅仅发生在觀念上的平均，是一个純粹的数学概念。

因此，問題不只是在于象宋巴特在他的年青力壯的理論中

所建議的那样，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方式，以便通过这种办法来不断地限制資本。相反，倒是資本的习惯，就是說，它的生产一个由当时当地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习惯”利潤的这个最重要的习惯，决定了当时通过工会行动可能提高工人习惯的界限。

就工会來說，也同任何社会力量因素一样，意識和力量对于社会过程的真正的和历史上唯一可能的干涉，不在于忽略過程的規律，倒在于認識这个規律，并且正由于認識了它，使它为自己服务。

这种看法，在宋巴特先生看来，当然是闻所未聞地贬低了工会的地位。他可以向工会作了許多諂媚奉承。但是，花言巧語的侍臣不是他的皇上的好顧問，同样，慷慨的諂媚奉承的人也不是工人运动的好朋友。如果宋巴特先生把工会捧得高于一切社会限制以上，向它把資本主义說得那么乐观，这的确是他的高尚品德；可惜的是，他能用什么来証实这一切呢？——不外乎是完全陈旧的、早已駁倒的庸俗經濟学的錯誤和混乱。

此外，政治經濟学上有一个新的发现是要归功于宋巴特先生的，他的同行的先生們的确至多从实际中也認識到，但是沒有認識到这样普遍的科学上的适用性，——这个发现就是，新娘的身份也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因素。

二

如果宋巴特先生在一方面說工会运动在經濟上万能，那么，在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万能的条件，条件是要把工会从社会民主党的“监护”之下解放出来。

的确，社会民主党創造了工会，并且不断地培养它，支持它

和保护它。但是，尽管有这一切情况，宋巴特先生却知道，社会民主党对于工会的事业总是半心半意的，甚至于直接“阻挠过”工会的发展。“因为，只把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在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的伟大时刻使社会民主党的少女灯上有油作为自己任务的这样一个政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把任何工会组织看成为临近的战役训练工人部队的学校。这是在最好情况下，至于说到很多的时候，它只会把工会运动当作自己事业的敌人”(《虽然如此!》第 60 頁)。这样的一个政党就不会有为建成工会所必需的“内心的安定”(同書第 64 頁)。如果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已经系统地推动过工会运动，那么，宋巴特先生不会从马克思关于工会对工人阶级的用处的是地出发来解释，倒是用别的动机来解释。就是，马克思不能同拉萨尔和他的门徒一样，对工会运动保持原则上的对立立场。因为，第一，马克思和他的“伦敦使者们”与英国工联会人物太接近了，他们不能“把工人在工会方面的全部组织要求(象对此完全无知的拉萨尔那样)不加思索地推在一边”。第二，最重要的倒是“马克思和他的门徒们也知道，在他们所梦想的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运动中，英国的工联会会员是缺少了不好的，否则会暴露出可笑的外貌，因为如此，第一国际刚一成立，对工会利益就给以相当的关心”(同書第 59 頁)。换句话说：马克思和他的门徒，原来最喜欢对整个工会运动狠狠地踢上几脚，可惜，由于英国工联会会员的力量，由于国际这个大动物园为完整起见应该代表无产阶级的每一个种族，所以少不得英国工联会会员，就不好踢得，所以他们看到为了不致于被人嘲笑，只得带着一副苦笑去啃那工会的苹果。

这一切都很明白。“历史的方法”，这会不幸被历史所当场

逮捕了。

还在 1847 年，那时第一国际也好，关于第一国际的全面代表性的关心也好，在梦中都还没有存在，那时马克思还没有在伦敦落户，因而同英国工联会还既不能接近也不能疏远，那时英国工联会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还完全隐在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的背后，在这时候，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

“工人們彼此結交的最初一些 尝試，總是采取聯合會的形式。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聚集到一个地方。競爭使他們利害分歧。但是，維持工資这个同他們的厂主对立着的共同利益，使他們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抵抗思想之中——聯合會。……如果抵抗的最初目的不过是維持工資，那么，依資本家为着压制而他們也联合起来的程度，最初各自独立的那些联合会就形成了集团，面对着不断联合起来的資本，維持協會就比維持工資对于它們还更加紧要。”^①

更妙啦！马克思不仅把工会运动建立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础上，并且說明了它的职能。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即傅利叶和欧文的信徒們拒絕工会的态度，他直接进行了尖銳的論战。他說他們是同資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們屬於同一等級的工会反对者：

“经济学家們願工人們停留在采取現在这种形态的、他們在他們的手册中描写过并且打了印的这样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願工人們撇开旧社会，以便能够更好地进入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是他們带着那么多的預見为后者准备了的。”^②

他最后說：“尽管有上述两种人，尽管有手册和烏托邦，工人

① ② 參閱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950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8 頁。

联合会沒有一刻停止过随着現代工业的发展和增长而发展和增长。今天已經到这个地步，一个国家中联合会的发展程度，精确地表示出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場的等級制度中占了什么地位。”

这就是說，馬克思早在 1847 年嘲笑过的欧文主义者和傅利叶主义者的見解，正是今天宋巴特先生拿来当作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者的見解来宣布的見解。而“正确的”、“現實主义的”、“历史的”方法，这次証明是先把現實历史歪曲一番而后根据它自己的歪曲来判决这个历史的方法。

可是，这个方法还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还替这个“修正了的”历史提出了邏輯根据呢。

宋巴特先生宣称，社会民主党不仅事实上早就从内心深处討厌工会运动，并且，不論过去和現在，它也不能不是如此，因此，工会的繁荣和发展，要把它从社会民主党的“监护”下“解放”出来的程度来衡量，这种“监护”，对工会只有起阻碍的作用。

在我們自己的队伍里，議論所謂工会中立化問題，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在我哋这里，拥护中立化的人們，只是从策略上的考慮出发的，就是希望把屬於不同政党的工人集合到一个統一的經濟斗争中來。工会方面的“集合政策”(“Sammelungspolitik”)，同近年来社会民主党在各方面提出的集合政策，完全是一个思想。如果在我哋这里，这些人以为掩蔽了最終目的，應該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力量，从而扩大它的直接政治成果，那么，在宋巴特，是要剥夺工会的社会主义性質来大大加强工会的宣传力量和經濟力量。

当然，德国工会現在也沒有把它的社会主义性質作正式規定，沒有把它作成會員的义务，但是它的当前全部工作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的。

社会民主党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个别集团还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对个别的目前的利益还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前者，既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为立法措施进行的政治斗争上，——这些措施涉及每个国家的全体无产者，是为了提高全体无产者的地位，——又表现在党的政策的国际性质上。后者，表现在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目的同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致上，——党是以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为准则的。

工会一开始只是代表工人的直接的当前利益，这是同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就是这些利益使它不得不走上下述的道路：第一，通过法定的标准使它奋斗得来的成果日益具有在国内普遍适用的性质，同时把工会力量在国际上结合起来。第二，它在全部政策上日益以社会的总的联系为依据，并估计到社会的发展，——全部政策，指对于罢工的态度，对于最低限度工资问题、按物价计工资制度问题、标准工资合同问题、最长工作日问题、失业补助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未受教育者问题、外国侨民问题、参与生产中技术管理问题、适当劳动权问题等等的态度。

因此，工会将由于自己的利益势所必然地走上社会民主党自觉地走上的道路。

因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所以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是因为有许多个人的关系把它连结了起来，也不是因为工会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监护之下”，而是因为德国工会从开始时起就将自己的政策和斗争放在正确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是因为历史——宋巴特先生的历史方法所那么讨厌的历史——的巧合使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全面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解，走到了为个别集团的利益和目前利益的斗争的前头。

如果社会民主党的集合政策結果必然牺牲了最后目的，那么工会的集合政策結果必然牺牲了德国工会現在的进步性質。关于社会发展远景的社会主义理解，这是一条紐帶，一旦把这条紐帶解掉，个别集团和职业的利益和狹隘民族利益，就又会在眼前出現，就象我們現在在英國看到的那样：对外，民族的閉关自守，內部，分裂状态，这种情况，任何地方都沒有象中立主义的乐园——英國工会运动中表現的那么利害的。

由此可見，在仔細觀察之下，工会的集合政策变成了分裂政策，而“中立觀念”，哪怕仅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慮，也是經不起任何严肃的批判的。

但是，就宋巴特先生來說，集合政策的觀点在他那里也只占一个十分次要的地位。他所得出的把工会从社会民主党“解放”出来的必要性，不是出于策略上的理由，而是从一个包含在工会本質之中的对立得出的。

这个对立在哪里呢？在于：依宋巴特先生看來，社会民主党总是把工会看成“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工会又只能当作“自己就是目的”才能兴旺发展。但是，如果事情就象到現在为止德国的情况那样，如果工会所依据的基础，是社会的总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最后結果就是社会民主党表述在自己的最終目的中的那个結果，那么，即使假定宋巴特先生所說的是合乎真理的，即使这样，在“手段”和“目的”之間，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之間，也沒有任何对立存在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社会民主党看來，直接的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本身不是更加可貴，而只是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它也必然要以最大的热心来建設工会。并且它必然同样会得到“內心的安定”，正如它在三十年來在参加資产阶级議會、劳动保护立法、总之进行全部当前的工作时有此

“內心的安定”一样。因此，在現在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和現在这样的工会之間，对立不可能存在，而最密切的联系則必然會存在。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設想有对立：如果工会不象現在德国的那样，而是站在別的基础上，如果它們象英國的旧工联会那样，不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站在現今社会利害協調的基础上，相信在这个社会內部有充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可能性，总之，如果它們站在我們刚才領教过的宋巴特先生的“正确的”、“現實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民主党和这些工会之間，当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因为，对于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利害協調的信念，对于劳动从国民收入中分取的份額可以不断提高的信念，对于一切庸俗經濟学的幻想，社会民主党当然要坚决地予以击破。这样的工会要同社会民主党并存，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工人們就要同“現實主义”方法的協調与幸福的梦想告別，不然，如果他們要忠于这个方法的梦想，就得拒絕社会民主党，二者必居其一。

这就是精神實質。在工会問題上，宋巴特的預言家使命的政治意義就在这里。“正确的”、“历史的”方法开头向工会打开了提高經濟地位的无限远景，为的是最后痛斥社会民主党，說它是妨碍提高經濟地位的真正障碍。

但是，宋巴特先生不是多次辯护，說他自己不是嗾使工会反对社会民主党么？他不是清楚地写过，說他的理想中的一个工会会员可以“附带地也是一个篤信社会主义的人，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么？”（第 64 頁）他不是自己确切表明并反复地说过，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不論今天，不論将来，都是唯一可能的工人政党么？

不錯! 因为副教授先生是一个具有非凡远見的人。从他的“鳥瞰”中他作过多次觀察，他知道种种事情。他知道，“在德国工人阶级圈子里那个政党（社会民主党）享有的威信是如此之大，其他任何方面如果要同他抗爭，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就得过几十年才行”，他又知道，“如果有人相信加强了工会就可以排斥社会民主党，那簡直是糊塗不清的烏托邦，”“以此为目的的任何政策，事先就注定着会毫无成果，”而“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每一个突击进攻，适足以加强它的地位。”总之，他知道——如果把教授式的晦涩难懂的話譯成坦率的德語——如果这位副教授想冒充工人，用温克施頓的笨拙方式去唆使工人反对社会民主党，那么，他同工人阶级的“一起努力”很快就到头了。因此，他容許他的那些“信仰很深的工会会员們”平靜地“附帶地”也做一个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所要求的只有一条：使社会民主主义“文明一些”，这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宋巴特的命題从他加于社会民主党身上的恭維話螺旋圈中旋脱出来，另外排列一下，——把它变成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深信：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包含比“街車市有化”更加根本一些的任何革新（第65頁），“资本主义經濟制度，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來說，今后还有几百年向前猛进”，而“經濟生活的重心在可以預見得到的时期內无疑地是落在資本主义企业身上”（第92頁），“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沒有相互排斥的对立，不如說，两者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很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实现”（第92頁），“归根結底說，工人还是相信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更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还是相信感化一个已經存在的政党更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是适宜不适宜的問題”（第78頁），就是說，究竟由誰来担负实现上述的社会主义，由社会民主党呢，还是由自由党、国家自由党、中

間派或者保守派呢？这完全是一个适宜不适宜的問題。

就我們來說，我們聲明堅決拥护国家自由党……

这里，我們就把“正确的”、“現實主义的”、“历史的”方法看得一清二楚了。直接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他們的学說么？——呸！多么不时髦，多么不現實主义，多么“非历史地”！不是！正是要把自己放在工人运动的地基上，把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把阶级斗争和最終目的——把一切忍受下来，把一切接受下来！只是……为工会本身的利益着想給工会一个这样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它必然同社会民主党对立起来，并且为了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利益把这个党改得文明一些，并且为了社会主义本身实现的利益，把社会主义变成同資本主义合而为一，总之，为了阶级斗争的利益把阶级斗争的頸子折断，——妙极！

“誰只要把事情理解到这样的深度，”宋巴特先生說，“他也就掌握了所謂勞工問題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三

政治经济学的“德意志科学”，早已发挥了警察的补充物的作用。如果警察是用棍棒对付社会民主党，那么这个“德意志科学”用的該是“精神武器”。

它是这样作了：首先，制造欺人的輿論，出产长篇大論的教授智慧的著作，来宣传利害协调，宣传阶级斗争荒謬。以后，当这些学說被馬克思粉碎之后，就用“反駁”，更多地是对馬克思和他的学生进行誹謗。后来，树立了一个資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天主教社会主义。最后，当教授們的混合物无人过問只有留給发明者自己去用，而馬克思的学說却在社会民主党的形

式上变成了赫赫逼人的力量的时候，就直接去支持警察，支持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

可是，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失败了，社会民主党肩头一耸就摆脱了普特加默尔，就同摆脱席费勒和施摩勒一样，在这时候，“德意志科学”就缩到书斋和讲坛去，从此安于领固定薪水教育资产阶级青年，让他们有符合于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公职的聪明。

于是有十年之久工人运动很少听到“德意志科学”。

资产阶级最后放弃了结果掉社会民主党的希望，它对两个奴才，对刽子手的臂膀，尤其是对教授的头脑，丧失了信心。

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一个经济高涨的时期开始了，它的结果，一个世界政策的时代也开始了。在资产阶级眼前展开了新的视野。继续了多年的繁荣，为推行世界政策准备武装和进行征服所暗示的金雨一般的利润，使资产阶级世界已经消沉的心又强烈地跳动起来。

但是，为了推行世界政策和“民族”政策，资产阶级需要人民群众的援助。另一方面，它相信在工业高涨和未来的希望中有吸引工人阶级的诱饵。所以，它鼓起新的勇气，再作一次征服劳动人民的尝试。号令又响了：学者们，上班去呵！干缩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象木乃伊一般的教授们又一个个露面了，赶到人民的集会中去，服服贴贴地在西蒙面前唱起德莉拉的恋歌，在无产阶级面前歌唱资产阶级世界政策的诱惑。

这位朝气勃勃、满怀信心、从头到脚都现代化的副教授宋巴特先生一马当先，他用轻盈的脚步和细致的表情舞着舞着。他知道手中有“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对顽固不化的无产阶级作出奇迹，他知道手中有“随机应变的

能力”，这是使他成为“世界政策”的名教授的护身符。威尔納·宋巴特先生对这种能力估价甚高，他通过不断的练习掌握了它。最初，他是馬克思的一个好学生，甚至为德国教授們所毫不姑息的老人恩格斯，也費过他几句奖辞。宋巴特先生在結束他的对恩格斯的悼詞时，說：“看来，他是一个好人。”

在那时候，宋巴特教授把駁斥馬克思主义學說的事，留給“政治野心家”去干了。但是，世界政策的时代，除摘了許多嫩芽以外也摘了勃累斯勞教授們在科学上的大公无私。弗兰茲·梅林在这个教授的头几步上就看透了他，及早呵責了他，應該說梅林又是作对了的。宋巴特先生陪着他的同事們一起投入政治“野心”的激流，終于走到了其他教授們开始的地方：为反对馬克思主义而斗争。

这个轉变既急速而又彻底。宋巴特先生以前証明德国不是从輸入国发展到輸出国，而是从輸出国发展到輸入国，这样他就附带地为保卫关税論者提供了他們所希望的論据，——的确使他的自由主义的同事們大吃一惊的。現在，他正同他的同事們并肩为德意志大艦队而斗争，这个艦队是“为了保护德国的輸出”而建造的。^①

以前，他向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保証，他有反对反动和剥削的热烈的同情，現在，他同温克施頓和萊維先生手挽着手代表世界政策的反动和世界政策吸取工人鮮血的事业。

^① 在1900年，德国政府提出的建立大艦队的議案在工人阶级中間引起了普遍的憤怒，柏林出現一群教授，想在人民的集会上鼓动无产阶级群众去拥护大艦队。这里并肩登場的有二老“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瓦格納尔，“社会和平”的預言家施摩勒，改名为“封·哈勒”的殖民爱国主义者萊維，十字报的教授温克施頓，还有从勃累斯勞来的工人之友威尔納·宋巴特。

以前，他要保卫欧洲文化的利益，反对亚洲的野蛮，现在，他拥护世界政策的沙文主义的野蛮，去反对欧洲和亚洲的文化。

以前，他保护馬克思主义学說，反对它的老敌人官方的“德意志科学”，现在，他是以这个“德意志科学”的名义登場反对馬克思主义。

宋巴特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一文中，关于拉薩尔的走进工人运动曾經这样說过：拉薩尔的“神通广大的”野心，完全决定了他必然找到“走上政治戰場”的道路，“一切有野心的人，如果他不能成为元帅或者艺术家，在我們这时代里必然走上这一条路。”

說到宋巴特先生自己呢，照我們的看法，他本来既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如走繩索的，或者，照他的航海热情看来，也可以成为一个海軍司令的，但是，他的野心显然比拉薩尔的还要神通广大。他宁可把走繩索的本領和海軍的热情都帶到“政治戰場”上来了。

他自觉地、坚定地上場，用一百年来的全部知識和所有的机敏武装着：他有叔爾茲·德列契的，叔爾茲·加維爾尼茲的，还有其他庸俗的叔爾茲的社会協調論，他有罗雪尔的历史方法，他有从韦伯夫妇拿来的英国式的狭隘性，他有拉薩尔的指手划脚，他有尤里安·施密特的自高自大，他有从所有語言、作家和时代找来的一口袋的引言，他有用曾祖父的古体和教授式的雄辯編織而成的文风，他有烏尔利希·胡頓的大言壮語和自以为是、玄妙莫測的謬論，最后，还有一种可靠的心理影响工具：辱罵和諂媚。

拉薩尔，就是这个矮教授用自己的小手去摹仿他的指手划脚的演講姿态的拉薩尔，在教授看来是一个伟大的野心家，因为

資产阶级政党拒絕了他，他就紧紧地抓住了工人阶级。^①

李卜克內西——在教授看来是一个“啦啦队的灵魂”（“Hipp=Hipp=Hurra=Geist”）。

倍倍尔呢，在汉諾威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坚持没收！”的口号的倍倍尔呢？这个教授在勃累斯劳的講演中，最初显然是照倍倍尔的样子鑄造了一个肖象，把他当作“政治兒童”的典型，这些“政治兒童，就不想看一下在門前究竟有沒有流着牛奶和蜜水的新國”，把他当作“正在死去的社会幻想家的一代的”典型，在这些幻想家头脑中，“一个沒有資本主义企业家的經濟生活制度行将到来的思想”还在作祟，一再預言那一天“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但是，也就是对这同一个倍倍尔，当宋巴特先生以为倍倍尔关于工会和政治的講演可以为自己的“現實主义方法”所利用的时候，就在他的講演集已經付印的最后一点鐘，他还在附录中灌上下面这一股迷湯：

他是屬於这样的“伟大領袖之列的，他們的威望决不是只是由于他們邏輯严密，而且是由于他們的高度敏感，由于有这种敏感，他們懂得偵察出人民灵魂中最隱秘的活动，”而当“群众的野心”（这位教授先生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只能想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野心！）变了的时候，“改变他們的見解”，而在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中，最充分地表現出他們的人民性；他，倍倍尔，“无时无刻憑自己的本能感覺出”群众有什么“願望和思想”，他好比是“社会民主党內各种思潮和方針之間的对角綫”。……这样，教授先生把倍倍尔描写成一个政治风向旗，此后，他还用了

①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第三版第46頁。

象倾盆大雨一般的个人阿谀，来对他行使压力：“意味深长的崇敬”、群众的“无限信任”、“热烈的心腸”、“坦率的性格”、“可爱的个性”、“鮮明活跃”、“如火的精神”、“公正誠实”、“随机应变的能力”完全象老恩格斯，同时才能方面完全象……老俾斯麦，体现着群众的希望和野心！宋巴特先生只忘記了，对倍倍尔不惜花费阿谀奉承，恰恰冒着得一笔意外收入的危险，因为正是倍倍尔而不是别人树立了下述的原理：敌人赞美我的时候，我就得立刻問問自己，有沒有作了傻瓜的事。

領導者之后，就輪到小人物，来交替地挨罵或者受捧。首先，“封·厄勒姆、雷琴、賽吉茲、密拉尔、第姆、都伯林、波厄希等人，”是“我們的工会軍官的新的一代”，排列成一个由“具有同样野心的”（唉，又是这个“野心”！到处都是“野心”，教授先生！）下級軍官所組成的适当的部队。“这些人”是“专职工会工作者”的“新的典型”，他們的“特有的才能和知識”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具有“新的精神”，一个“特有的灵魂”，这些“能干的”人們創造出“新的信仰”，等等，等等。

我們从工人出身的政治鼓動員們受到的待遇，却不同于上述的由宋巴特先生照自己的理想改成工会工作者的那些“軍官”。关于他們的情形，教授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这些浅薄的、无头脑的空談家”，这些人現在还在報紙、人民集会和联合会中多方面占着领导地位，他不想知道那些游手好閑的人，他們什么都不行，只会把几句背得烂熟的、連自己也不懂的、从党的文件中学来的句子，象鸚鵡一般反复地空談，或者象牯牛一样到人群中去嚎叫，除了这种“党的鼓动工作”，干什么工作都不行，——宋巴特教授先生想把德国工人阶级从这种“漫画式的政治鼓動家們”解放出来……（第91頁）。

宋巴特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第 99 頁)中，痛心地悲叹在我们的阶级斗争中，优美的风气和文雅的方式都变坏了。“只就表面来看，表示意见的腔调，多刻薄，多伤人，多粗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应该是这样么？”

这些话，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感到是直接从我们心底里说出来的。我们早就因为党内的腔调和语言变得粗暴感到痛苦，终于有人向党严正地提醒这件事，我们实在高兴。宋巴特教授本人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可以驳斥他的对方，但仍然用一种文雅的、贵族客厅里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如此，我为了怕自己也犯刻薄、伤人和粗暴的腔调，为了安全起见，我确切地用了教授先生的语言。

可是，您愿意让工人阶级摆脱“漫画式的政治鼓动家们”么，副教授先生？这里您原来指的是哪些人呢？也许一世纪以来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律下被投进监狱背后的、社会民主党的无数鼓动家是游手好闲的人么？您这位政治经济学的文人，您是在学院和资产阶级的客厅里，在安全地带度日子呵！

也许是我们的小型地方报纸的坚决的编辑们和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家们么？他们历尽无法形容的辛苦，从他们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努力上进，在坚毅的斗争中去求得每一点教育，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己估成伟大解放学说的信徒，也许他们就是您所说的那些“浅薄的、无头脑的空谈家”么？您这位浅薄的空谈家，从青年时代起人家就用德国政治经济学的陈腔滥调和一望而知的东西灌输给你，为了让你——如果上帝和世界政策帮助的话——成一个正教授！

是我们的无数无名鼓动家么？他们每一秒钟都把自己和家庭的生存作孤注一掷，孜孜不倦，一次又一次地在集会上和在团



2 024 1995 3

体中把群众鼓动起来，他們千百次地反复宣传社会主义的福音，宣传那些既老而又是永远新鲜的話。您說那些“漫画式的政治鼓动家”，那些“象鸚鵡一样”“反复空談”党的文件的字句的人，或者“象牯牛一般到群众中去嚎叫”的人，您指的是他們么？您这个可笑的拉薩尔的漫画，是您，象鸚鵡一样反复空談老李坦內·勃倫塔諾的話，把認定社会民主党要灭亡的古老学說拿到群众中去，——誠然不是吼叫，却是利用他們的朴实和善良，去窃窃私語，阿諛奉承和造謠中伤！

教授先生在以申斥和恭維侮辱了工人阶级大小领袖以后，向听众告别时作了保証，說工人阶级决无理由缺乏勇气，因为“德意志科学”也站在他們背后，支持他們所追求的目标。

可是，这是什么“德意志科学”呢？是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噴濺毒液和胆汁的科学，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反社会主义者法律的科学，是后来想捉住工人阶级去支持海上軍国主义和世界政策替自己得个勋章的科学，最后，是想用愚蠢的煽动讓有組織的无产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的科学，——这样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宋巴特教授，是您想把社会民主党“搞得文明一些”的科学，它不是站在德国工人阶级的身后，它是站在海軍陸战队背后，这支海軍陸战队，这时正在中国登陆，为了完成倒奴人的文化使命。

如果要說它站在工人阶级的“背后”，那么，頂多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說，德国工人阶级对于这个佩带勋章的、起犹大作用的、吹的鼓鼓的、随机应变的“德意志科学”，今天也同过去任何时期一样，总是带着应有的輕蔑，——背朝着它的。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第一部分

-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第二部分

- 一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 二 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 三 夺取政权
- 四 崩溃
-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

民军和军国主义

站在工人背后的“德意志科学”